



总第73期

73

2018年 | 第1期 |

深圳市律师协会主办

SHENZHEN LAWYERS

深圳律师

—— 非常视线 专业见解 ——



新时代 新格局 新机遇

—— 第十届中国律师论坛成功召开 促进律师事业改革

《律师法》再修改的背景和进路

律师履职党政机关法律顾问的若干思考



深圳律协公众号

第十届中国律师论坛掠影



现场签到有序进行



手机扫二维码完成签到手续



为参会人员准备了“大礼包”



接送参会人员往返住宿酒店与主会场



观看中国律师发展成就图片展示墙



开幕式上全体嘉宾齐唱国歌

2018年1月7日-8日，时隔七年的中国律师论坛在美丽的鹏城恢复举办。来自全国各地近千名律师，围绕“《律师法》修改与深化律师制度改革”主题，共话新时代中国律师事业发展。

司法部部长张军、副部长熊选国出席开幕式并分别作主题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徐显明，最高人民法院副部级专委刘贵祥，广东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何忠友，深圳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李华楠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广东省司法厅厅长曾祥陆，深圳市副市长徐文海等出席论坛。

本届论坛全面反映了近年来我国律师行业发展成就，围绕当前深化律师制度改革的部署，聚焦律师行业前沿和热点问题，搭建了政策理论和实践经验研究分享平台，提高了广大律师执业能力与水平。

第十届中国律师论坛深圳宣言

南海之滨，深圳湾畔，东方风来满眼春！

发端于2001年的中国律师论坛，是律师行业顺应新世纪发展潮流，共同创建的研讨律师制度、创新律师业务、增进交流合作的盛会，在国内参与人数最多、影响力最大。时隔七年，中国律师论坛在深圳恢复举办，回应了广大律师多年来的呼声，继承和发扬中国律师的优良传统，为律师事业改革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论坛期间，我们围绕《律师法》修改与深化律师制度改革主题，从《律师法》修改、律师管理体制、涉外法律服务等8个方面进行了充分的交流和探讨。我们应当共同致力于健全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律师制度，紧紧围绕本轮《律师法》修改的基本思路和重点问题，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在全面依法治国伟大实践中彰显律师制度价值。

我们体会到：党的领导是律师事业发展的根本保证。四十年前，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四十年后，中国创造了世界奇迹，以大国形象屹立于世界东方。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进行了深层次、根本性变革，取得了全方位、历史性进步。律师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见证者，律师事业的发展得益于改革开放，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律师事业发展。新时代，我们必须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把党的领导坚定不移地贯彻始终。

我们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律师事业也将迈向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论坛上，大家共同探讨律师行业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共同迎接新时代给中国律师事业带来的新机遇、新使命和新要求，共同谋划新时代律师工作改革发展。我们应一如既往承担起新时代赋予律师行业的历史责任，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法律服务理念，创新法律服务方式，拓展法律服务领域，促进律师事业充分平衡发展，使人民群众获得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

我们感受到：改革开放和科技创新是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不竭动力。论坛上，我们就如何发挥律师在“一带一路”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国际倡议和国家重大经贸活动中的作用分享了经验，对律师行业如何共享科技发展红利提出了思考和应对之策。我们要紧紧抓住改革开放和科技创新带来的新机遇，不断推动律师制度创新、律师业务创新、发展模式创新，建立起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适应的中国律师法律服务体系。

我们意识到：履行社会责任、加强行业自律是律师行业走向成熟的根本路径。我们围绕如何满足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提出了拓展公共法律服务内容的思路方法；围绕打响律师行业品牌，对律师的文化、职业精神和自身健康进行了研究；围绕贯彻“挺在前面”和“严管厚爱”的总要求，探讨了履行行业自律职责、展现律师职业新面貌的路径，形成了助推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践行社会公益责任、树立良好社会形象的共识。我们应当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秉持法律人严谨、审慎的专业态度，勤于自省，勇于自律，切实增强服务意识，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提供新智慧。

改革创新是深圳的根、深圳的魂，改革创新也是新时代中国律师的源头活水。新时代，我们要肩负起深化依法治国实践的新责任，勇立潮头、奋发有为，阔步迎接中国法治事业的明天！新时代，我们要顺应职业和时代所赋予的新使命，凝聚共识、精益求精，共同谱写中国律师新的华美篇章！

粤内登字B11277号



出版日期 2018年2月

编委会主任 林昌炽
编委会成员 章成 蔡华 杨道
尹成刚 曾迈 江定航
韩俊 汪腾锋
主编 汪腾锋
执行主编 王红 陈伟
栏目编辑 周争锋 陈伟 杨新发
舒笑 陈旭绯 颜宇丹
责任编辑 伍春红
编辑 刘峰 王颖 王文超
美编 谭洁莹 岑均权
电话 0755—83025789 83025881
传真 0755—83025177
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4001
号时代金融中心20楼
邮政编码 518048
电子信箱 shenzhenlawyers@163.com

目录

CONTENTS

热点 | P4-9

- 4 新时代 新格局 新机遇——第十届中国律师论坛成功召开 促进律师事业改革

《律师法》修改 | P10-15

- 10 《律师法》再修改的背景和进路
13 关于《律师法》修改的十六条建议

律师管理体制 | P16-22

- 16 新时期的律师协会管理如何做到“严管厚爱”
19 律师事务所风险控制体系建设



P4



P25

涉外法律服务 | P23-29

- 23 律师合作视角下的粤港澳法律服务业建设
27 中国仲裁国际化及律师在商事仲裁中的角色

科技驱动法律 | P30-36

- 30 科技驱动背景下的法律服务革命
34 人工智能助力公共法律服务

律师业务创新 | P37-42

- 37 共享经济商业模式的法律结构关系
40 “决策环评”业务的新时代空间

律师文化建设 | P43-49

- 43 试论新时代下律师事务所品牌建设
46 以“和”为主线的律所文化建设思考

律师社会责任 | P50-56

- 50 律师履职党政机关法律顾问的若干思考
54 律师调解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的价值与定位

律师制度改革 | P57-62

- 57 青年律师如何有效参与刑事辩护全覆盖
60 律师的角色定位及其执业伦理建设



新时代 新格局 新机遇

第十届中国律师论坛成功召开 促进律师事业改革

2018年1月7日-8日，时隔七年的中国律师论坛在美丽的鹏城恢复举办。此次第十届中国律师论坛由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主办、深圳市律师协会承办，来自全国各地近千名律师，围绕“《律师法》修改与深化律师制度改革”主题，共话新时代中国律师事业发展。

司法部部长张军、副部长熊选国出席开幕式并分别作主题报告。最高人民法院副检察长徐显明，最高人民法院副部级专委刘贵祥，广东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何忠友，深圳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李华楠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广东省司法厅厅长曾祥陆，深圳市副市长徐文海等出席论坛。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徐显明



最高人民法院副部级专委 刘贵祥



广东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何忠友



广东省司法厅厅长 曾祥陆



深圳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 李华楠



深圳市副市长 徐文海

中国律师论坛是国内影响力最大的全国性律师交流活动。本届论坛设8个分论坛，从《律师法》修改、律师管理体制、涉外法律服务、科技驱动法律、律师业务创新、律师文化建设、律师社会责任、律师制度改革等8个方面进行了充分的交流和讨论，内容丰富，亮点纷呈。

论坛闭幕式上，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发布了2017年度中国律师行业最受关注事件和人物。论坛最后

形成了《中国律师论坛深圳宣言》（作为卷首语刊登），这份宣言是经过全体参会律师代表的酝酿和讨论的思想共识，是代表34万律师在新时代面对新挑战承担新使命、新责任的庄严承诺。

本届论坛全面反映了近年来我国律师行业发展成就，围绕当前深化律师制度改革的部署，聚焦律师行业前沿和热点问题，搭建了政策理论和实践经验研究分享平台，提高了广大律师执业能力与水平。

新时代中国律师走在依法治国的方阵里

开幕式上，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张军就律师行业党的领导、新时代中国律师肩负的历史责任、律师在执业过程中的困难和律师在深化依法治国实践中建功立业四个主题作报告。

张军表示，此次论坛的举行，适逢中国改革开放迎来40周年的历史节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伟大时刻、认真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可谓意义非凡。

张军部长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郭声琨的重要讲话精神，对多年来广大律师自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道路，以精深专业知识、缜密的逻辑能力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为当事人提供专业化的法律支持和服务，在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

张军认为，党的十九大为新时代律师工作再上新台阶，推动律师事业改革发展加快速度、写好新篇章指明了正确方向。律师行业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关键要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用十九大精神武装头脑、指导实践，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为人民日益增长的更好生活需要，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以34万律师职业之担当、执业之审慎，以法律人精工之笔触、有据之言论，共同描绘“两个百年”壮美画卷！

张军指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



司法部部长 张军

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律师事业发展。坚持党对律师工作的领导、加强律师行业党的建设，不是一句口号，更不是权宜之计，是与中国国情完全契合、完全相适应的基本制度安排，是事关律师事业长远发展的政治制度安排。加强律师行业党的建设就是一项铸魂工程，是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伟大工程重要内容之一。

张军指出，在新的历史征程中，“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对律师来说，既有广阔空间，又提出了新的挑战。我国律师事业改革发展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广大律师在思想观念、能力素质上有没有做好准备？“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中，涉外律师人才队伍建设能不能满足需求？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律师有没有适应这个变化？律师能不能在党委政府决策中履好职、服好务？推进刑事

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律师的数量、职业道德水平和出庭辩护质量是不是适应需要？建立律师调解制度，律师、律所的公信力能不能满足社会要求、获得群众认可？这些都是我们要高度重视、一一破解的问题。

张军认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对律师职能作用发挥提出了新要求，对整个律师行业提出了新期待。律师是提供公共法律服务的主体，要承担起新时代赋予律师行业的历史责任，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法律服务理念，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新时代满足人民新期待是《律师法》修改的主旋律

司法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全国律师行业党委书记熊选国就《律师法》修改作了主题报告。熊选国强调，《律师法》修改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以促进律师行业充分、平衡发展为总目标，坚持规范行为与保障权利并重，坚持中国特色与借鉴国外经验相结合。新时代满足人民新期待是律师法修改的主旋律。

熊选国指出党的十九大把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确立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的重要内容，提出把法治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结合，深化依法治国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在报告中强调，到2035年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到本世纪中叶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目标，标志着全面依法治国进入新时代、开启新征程。党的十九大为做好新时代律师工作、推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律师事业改革发展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前进方向。

熊选国介绍，从198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到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再到后来的几次修订、修正，可以说，《律师法》的每一次修改，都促进了律师制度、律师工作和律师事业的发展。从2007年《律师法》修改到现在，短短十年间，律师队伍人数从14万发展到34

点，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使人民群众有更实在、内涵更丰富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最后，张军强调，律师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力量，要以《律师法》修改为契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律师制度改革的决策部署，推进律师事业改革发展，完善律师执业权利保障，规范律师执业行为，加强律师队伍建设。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和广大律师都要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律师制度承担起自身的职责，都要在深化依法治国实践中贡献自己的力量。这既是对律师队伍的鞭策，更是对律师队伍的瞩望。



司法部副部长 熊选国

万多人，律师事务所从1.3万多家发展到2.6万多家，律师业务总量从240多万件增长到440多万件，律师事业的迅猛发展为法律修改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相对于现行《律师法》的规定，我国律师在职业定位、职业内容、执业环境、管理需求、权利保障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及时对律师法进行修改，关系律师制度改革成果，关系到律师行业长远发展，非常必要。

熊选国认为《律师法》修改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把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全面落实到律师工作中，始终确保律师工作的正确方向；要着眼于更好地服务人民群众，把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贯彻到律师法修改中；要围绕律师行业更加充分、平衡的发展

这个目标，为壮大律师队伍、拓宽律师业务领域、提升服务专业化水平等提供法律保障；要一手抓维权，一手抓惩戒；要立足适应新时代律师工作发展需要，让律师法修改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为今后一个时期律师工作发展预留好制度空间。

熊选国强调《律师法》修改要以问题为导向，真正解决制约行业发展和行业管理的突出问题。要进一步明确律师定位；要健全完善律师执业准入、退出的基本标准；要健全完善律师事务所的设立条件和管理规范；要健全完善律师执业行为规范和违法行为处罚规定；要健全完善律师年度考核的内容和标准；要健全完善律师执业权利保障有关规定；要明确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制度的法律地位；要健全完善律师管理体制。这八个问题，都需要认真研究，广泛听取意见，在法律修订过程中仔细斟酌，全面论证，做出科学回答。

据悉，司法部高度重视《律师法》修改工作，

已经成立修改《律师法》工作领导小组，并深入开展调研，召开座谈会，广泛听取意见和建议，做了大量基础性准备工作。近日还将成立《律师法》修订工作专班，由司法部有关司局和全国律协参加，同时邀请部分专家学者和知名律师参与，共同承担具体修订工作。

这次中国律师论坛的主题是《律师法》修改与深化律师制度改革，《律师法》的修改不仅关系到律师事业持续健康发展，更关系到新时代全国依法治国的顺利推进。熊选国谈到律师法修改已纳入国家修法规划，给律师界带来鼓舞。

熊选国真诚地希望广大律师应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集思广益，充分发挥律师职能作用，积极参与到《律师法》修改工作中来，共同出谋划策，凝聚集体智慧，切实把《律师法》修改好，把律师制度完善好，为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论坛精彩亮点纷呈 成效显著

为期一天半的第十届中国律师论坛，是律师业界一次不同理念碰撞、不同观点融合的知识盛宴，也是在新形势下对未来律师行业发展的一次展望与

突破。本届论坛精彩亮点纷呈。

一是意义深远。1979年，改革开放第一炮在蛇口打响，1983年，中国第一家律师事务所在深圳蛇口



诞生。论坛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提升律师执业素养和社会责任感、使命感为主旨，在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蛇口举办，传承改革精神，共襄法治盛举，意义深远。论坛择定在深圳举办，体现了司法部、深圳市政府对深圳律师工作的肯定与厚爱，宣传了深圳改革开放与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展示了深圳法治事业和律师业发展成就。

二是契合大势。论坛在开幕式致辞、主题报告、嘉宾演讲、背景设计、宣传展板、媒体报道等各方面融入十九大、改革开放元素。信息化手段运用贯穿论坛始终，前期开发网上报名及征文系统，实现大数据计算和分析，论坛期间手机扫二维码完成签到手续、自主选择论坛照片等，大大提高工作效率，方便了与会代表。深圳市律协还邀请承接G20峰会会务人员到会指导，做到了专业周到、零失误。

三是规格空前。司法部部长张军、副部长熊选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徐显明、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刘贵祥，广东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何忠友，深圳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李华楠、副市长徐文海等领导出席论坛，全国32个省市自治区司法厅（局）和15个计划单列深圳市司法局分管律师工作的领导全部到会，规格高、覆盖广，为历届中国律师论坛之最。

四是主体多元。论坛参与的多元化色彩更加浓厚，高层次、权威性特点更加突出，吸引了全国32个省市自治区律师代表和港澳律师代表踊跃参与，工商界、法学界代表也积极响应。比亚迪公司总裁王传福及华为、平安保险集团等企业高管进行了精

彩演讲；北京大学陈瑞华教授、中国政法大学王进喜教授等著名学者担任主讲嘉宾；深圳国际仲裁院、蓝海现代法服务中心等知名法律服务机构负责人也发表了主题演讲。

五是树立新风。论坛不设空飘和彩旗，主席台不摆放鲜花，要求发言嘉宾紧扣主题并控制时间；论坛采用自助餐安排，并按不同参会人员的风俗精确到用餐类型（如清真餐），杜绝铺张浪费；深圳市律协组织全体理事于论坛期间自备车辆，全天候接送参会领导嘉宾往返会场与酒店。服务细节彰显出本届论坛既隆重热烈，又节俭务实，各环节均体现对中央“八条规定”的严格遵守和有力贯彻。

本届论坛圆满举办的同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受到媒体多角度报道和解读，也获得律师群体的高度赞许。

一是凝聚了共识。司法部部长张军和熊选国副部长的主题报告，都强调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用党的十九大精神武装头脑、指导实践，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做好律师工作。论坛形成的《中国律师论坛深圳宣言》，倡导中国律师在法治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吹响了中国律师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的集结号，奏响了律师业发展最强音。把党的领导作为律师业发展的根本政治保证，得到演讲嘉宾和与会律师的拥护与支持。

二是贡献了智慧。分论坛分涉外法律服务、科技驱动法律、律师社会责任等八个主题进行。论坛评选出117篇优秀论文汇编成《中国律师论坛精选论文集》，梳理汇集《律师法》修改意见建议376条，为《律师法》修改提供了参考，为“一带一路”、“互联网+”等背景下企业发展提供了法律解决方案。

三是宣传了深圳。本届论坛既是深圳律师事业发展成就的一次全景扫描，也是对深圳律师业改革创新的一次纵深发动，更是深圳法治形象的一次集中展示。论坛的成功举办，在全行业迅速掀起了一股学



比亚迪公司总裁 王传福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陈瑞华

习、讨论、思考、实践法治的热潮。法治日报、南方都市报、深圳特区报、法制网、光明网等主流媒体均对论坛进行了正面报道，媒体编发新闻报道164篇，社会各界发布微博530条、推送微信文章211篇，提升了深圳律师业和深圳一流法治营商环境的知名度、美誉度。

四是搭建了平台。论坛的成功举办标志着世界瞩目的十九大后，中国律师业形成了合作的共识和愿望，重新建立起一个新的沟通路径和交流合作平

台。论坛以法律为媒介，开展战略性对话，探讨中国律师业发展，不仅加强了区域性法律交流合作，还促进了新形势下律师体制改革的相关思考，为推动深圳与全国各地律师业共同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企业法务、执业律师同台对话，搭建起了法律机构及企业信息沟通交流平台，有助于形成法律服务推介与需求供给对接机制，诸多律所表达了在深圳设立分所助力深圳发展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意愿。

领导重视、部门联动、团队合力保证了论坛的圆满举办

论坛从筹备到召开不过三个月，时间紧、任务重。广东省司法厅、广东省律师协会、深圳市司法局、深圳市律师协会为论坛顺利、成功举办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深圳市南山区政府也给予了很大的支持。

领导重视是论坛成功举办的前提。论坛筹备期间，深圳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李华楠亲自协调论坛筹备工作，召集相关单位部署工作；副市长徐文海专门召集现场会议听取论坛筹备情况汇报，对政治安全等方面做出周密部署；市政府副秘书长王虎善多次召集论坛筹备工作协调会，就论坛政治安全、经费安全、舆论安全等作出细致安排。深圳市司法局成立了由蒋溪林局长任组长、梅爱民巡视员任副组长的会务协调工作小组，全面指导论坛筹备工作；深圳市司法局副局长任继光协调做好市政府支持款拨付工作，同时对接市公安局于论坛期间坐镇现场，全面统筹论坛安保工作。论坛举办期间，深圳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如桂在百忙之中安排时间会见司法部部长张军。这为论坛稳步推进、成功举办提供了正确指导、坚实保障。

部门联动是论坛成功举办的关键。在深圳市政府的大力推动下，成立了第十届中国律师论坛会务协调协助小组，市委宣传部（市网信办）、市委政法委、市财政委、市市场监管委、市公安局、市司法局、市接待办、市信访局、南山区政府等单位成为成员单位，在人员审查、宣传推广、舆情管控、会

务安保、资金保障、食品安全、信访处置、会场保障等方面为论坛提供了强大助力。各单位均明确了责任领导和具体联络员，按职责分工制定了详细的落实方案。短短三个月筹备期内，市司法局共牵头召开了16次碰头会，4次推进会，不断细化、筹备事项，督促各项工作推进落实。各单位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勠力同心将各项工作落到实处，为论坛成功举办提供了有力支撑。

团队努力是论坛成功举办的保证。深圳市律协制定了详细的工作方案，协会会长工作团队成员全部参与论坛工作，采取论坛责任包干制，每位会长负责承接一个分论坛，同时选定政治觉悟高的理事，与秘书处人员组成材料、组织等十个工作小组落实具体工作。从与会代表落地接站，到参加会务活动、餐饮安排、个性化服务，直至送站离深，服务到人、到点、到位，以最佳的工作姿态服务与会代表。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新时代律师队伍的建设，任重而道远，厚积而薄发。我们坚信，只要全体律师始终怀有一颗初心，始终怀有一份敬畏，哪怕前进的路上还有不少困难，还有不少沟坎，也一定会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迎来属于中国律师的新未来！新时代新机遇新征程，34万中国律师已经走在依法治国的方阵里，我们坚信，在未来的法治实践中，中国律师一定会交出一份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满意的答卷。



《律师法》再修改的背景和进路

王进喜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律师制度的成文法律，第一部是1980年颁布的《律师暂行条例》，第二部是1996年颁布的《律师法》。时至今日，律师队伍和行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律师制度也进行了多次重大改革，经历了四次不同程度的修改。2007年的修订是迄今为止修订幅度最大的一次，其他几次都是技术性的修改，可以称之为修正。现在又把《律师法》的修改提上了议程，十年一次修法意味着这次修法可能奠定了中国律师行业未来十年发展的基本格局。

《律师法》再修改的背景

我国法律职业的构成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律师行业成为中国法治建设的重要基础

2016年最高法和最高检的工作报告表明，法

院、检察院已经完成了员额制改革，入额法官和检察官加起来不会超过25万名，基本已成定局；而律师队伍没有员额限制。也就是说，法官、检察官队伍的发展已经受到限额了，大量的法学教育的产品便会涌入

到律师队伍当中，所以律师人数发展到四五十万指日可待。这是我国法律职业结构性的变化，我国律师人数去年年底已经突破35万，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建设法治国家的一支重要力量。

这样一支庞大的律师队伍管理不好，必然影响到中国法治建设。律师队伍已经成为观察中国法治建设状况的缩影，律师队伍的建设实际上也代表着中国法治队伍的建设。

社会对律师行业的认识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1980年《律师暂行条例》规定，律师是国家法律工作者，到1996年《律师法》确定律师是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再到2007年修法后明确，律师是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强调律师职业的公共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进一步明确提出，律师是社会主义法治工作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把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法治作为律师从业的基本要求，增强律师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各级党政机关和人民团体普遍设立公职律师。可见，随着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依法治国战略的深入推进，社会普遍认识到律师的重要性，对律师行业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

科技的发展对律师行业的重大影响日益浮现

互联网等科技手段的应用塑造了律师行业很多问题。比如，有的律师受到行政处罚了，却能在其他律师事务所的网络平台上接业务，脱离了其在律师事务所的管理，这便是科技发展带来的新问题。有了微博、博客、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后，律师执业权利义务如何保障、道德行为如何管理等，在修法里要有所体现，这是要谨慎考虑的。另一方面是人工智能对行业的影响。移动互联、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现代科技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法律服务的解集，促进了律师服务的产品化。虽说人工智能还不能取代律师，因为它取代不了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从这个意义上讲，诉辩律师是和法官、检察官进行沟通的，诉讼律师就有了重新崛起的可能性，人工智能势必会造成行业的重新洗牌。

律师行业存在的一些问题必须加以面对和解决

具体地说有三大问题：其一，律师行业迅速发展的态势和管理队伍发展的不平衡。比如，北京市现有律师管理人员30人，管理26000多名律师，天津市由编制的律师管理人员10人，管理6000多名律师。其二，律师行业管理需求与管理手段的不平衡。比如，被吊销执业证的人员能否参与法律服务活动的问题，现有行政处罚、行业纪律处分手段和程序已经无法满足律师行业管理的问题，等等。其三，法治建设的需求与律师队伍职业道德建设现状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从律师中选任法官、检察官的重要条件之一是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即是加强律师执业道德建设，是实现法律职业共同体流动的重要前提条件之一。但这十几年律师队伍的高速发展却导致了律师队伍质量出现了不少问题，修法时必须考虑如何加强律师执业队伍道德建设，在准入时就要设置较高的道德要求条件，同时要降低退出的门槛。美国每年吊销律师执业资格大约是700~1100人，国外的律师执业其实受到的约束是很多的。再有，律师职业道德建设方面突出的一个问题是缺乏系统的行业规范。让律师协会在律师管理方面挺在前面，缺乏工具和手段是挺不了的，因此应把行规挺在法律、行政规范的前面，实现规范之间的“无缝衔接”，把律师执业行为规则和职业道德作为律师行业管理的常态工具。

法律服务行业的全球化竞争已经不可避免

衡量全球法律服务市场活力的重要指标之一是跨境律师事务所的合并活动。如何解决法律服务贸易的顺差和逆差问题？实际上我们现在是逆差，我们从国外购买大量的法律服务，这样本土的律所就要参与全球化的竞争，这必须在律所的组织形式上下工夫。法律服务行业要走向国门，这也是“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律师制度实施三十多年来，无论是中国律师业本身还是其所处的社会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尽管在2007年对《律师法》进行了一次重大修

改，但离律师法律制度走向成熟还有很长一段距离。随着时代的进步、形势的变化，对其进行修改势在必行。

完善律师管理体制应是此次修法的重中之重

修改法律的路径很多，涉及的问题也很多。我认为核心问题是要进一步深化司法行政部门行政管理和律师协会行业管理两结合的管理体制。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律师事务所管理，发挥律师协会自律作用，规范律师执业行为，监督律师严格遵守职业道德和职业操守，强化准入、退出管理，严格执行违法违规执业惩戒制度。”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律师队伍建设提出的要求，本质上是对律师管理体制提出了改革建设要求。

律师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理问题是理顺司法行政机关与律师协会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发挥律师协会应有的作用，真正的落实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之间的监督和被监督关系。

《律师法》第四条规定，司法行政部门依照本法对律师、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协会进行监督指导。但实践中司法行政部门对律师协会采取了行政管理方式，律师协会被视为司法行政部门的下属部门，律师协会的内部运作仍然有着浓厚的司法行政管理色彩。

另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现行两结合管理体制下，制定和执行执业行为法的主体重叠，权限不清。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都在对律师的执业行为进行规制，比如说，司法部2010年颁布了《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制定了《律师执行行为规范》，但律师协会制定的执业行为规范不具有法律效力，律师对律师协会进行的行业处分不服的，难以获得有效的法律救济。这种分立局面又造成了律师协会的处罚权力软弱，难以进行有效的管理，所以在两结合管理体制下执业行为法或职业道德规范方面还存在着很大的建设的空间。

我们看看英国的做法，英国的律师业比较发达，仅仅依靠行业自治是不行的，2007年以后进行

了律师行业大规模的改革，设立了法律服务理事会，对各个律师协会进行监督，比如说事务律师协会对事务律师进行监督管理，法律服务理事会监督被核准的规制者，监督事务律师协会是不是把律师管好了，所以它是元规制者，律师协会管的不好，可以采取经济处罚、介入管理等措施，甚至取消对核准规制者的委任，再成立新的律师协会去管理，这样来建立二者的监督和被监督关系。

我国的司法行政机关面临着35万律师甚至40万律师，我们也要建立这样一个宏观的管理模式，从这个角度讲，应该在《律师法》里就律师协会的职能设定科学可行的目标和监督的程序，以及未履行、未充分履行其职责情况下的处罚措施。司法行政机关应当监督律师协会对这些目标的落实情况，不再承担具体的投诉调查、惩处等工作任务。

要体现司法行政机关对律师协会的监督，前提是要发挥律师协会的作用，迫切 need 要加强律师协会的组织能力建设。现行《律师法》虽然对这方面做了一些规定，但是并不清晰。《律师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律师协会是社会团体法人，是律师的自律性组织”，应当说，这一规定既强调了律师协会对律师行业的代表职能，也强调了律师协会对律师行业的规制职能。但是，从立法和实践情况来看，对律师协会的代表职能重视得多，对其规制职能重视得少，二者之间的结构性冲突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律师协会各类规范的科学性、有效性尚待加强。这就要将律师协会的规制职能和代表职能适当区分，加强专门委员会规范化建设，合理配置三级律师协会的职责。这次修改《律师法》应当进一步加强加强对律师协会职能的规定，改变《律师法》的律师管制法外观，把它升华为律师行业的组织法。

尽管目前的律师法还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但毫无疑问，它已经奠定了中国律师业发展的基本走向和格局。目前，新一轮《律师法》修改的号角已经吹响，在全国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我们有理由相信，只有完善两结合管理体制才是结构性的改革，这将推动中国律师业健康发展的车轮滚滚向前。

关于《律师法》修改的十六条建议

苏文 海南省律师协会



一、应进一步明确律师协会的行政主体地位

在一个统一的律师制度之下，律师协会的性质应当是统一的。

目前，各级各地律师协会性质不一，有的是事业单位、有的是社团、有的是行政单位，等等，五花八门。然而律师协会的部分职能，如对执业律师的年度考核，对实习人员的培训考核，对律师违法执业行为的行业惩戒等，实际上是从行政职能转移过来的，具有一定的强制性，行政行为的属性明显。

各地法院对律师或实习人员对律师协会提起的诉讼，无一例外都把它作为行政诉讼来立案，并认定《律师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律师协会的职能是法律授权的行政行为。

不论是欧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国家的律师公会都是承担公共管理的法人组织，即“公法人”的性质，不是纯粹的民间社团（即私法人），欧美律师协会对行业管理远比我们严格，如美国，一年要吊销一千多个律师执照。

因此，此次修改《律师法》，建议进一步明确律师协会作为公法人的行政主体地位，这对律师行业的规范管理和发展百利而无一害。

二、新增条款，明确除了司法行政机关以外，任何行政机关都无权行使提供有偿法律服务的

行政许可权

目前，公民可以到工商局注册成立法律服务咨询公司，有的甚至在公司名称中加入“律师事务所”字样。广东、海南、山西等地已发生多起案件。

律师事务所提供的法律服务，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诊所、设计院等机构一样，具有高度的专业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诊所、设计院等均由业务主管机关予以许可，而不是到工商局注册登记，或是业务主管机关先予前置许可后，再到工商局进行登记，均实行严格的行政许可制度。

律师事务所提供的法律服务，与会计师事务所提供的财务审核，设计院提供的设计图纸，诊所提供的诊疗服务有着本质的区别。法律服务是关乎社会公平正义的专业服务，具有政治性，是民主法治的组成部分，特别是律师参与诉讼的服务，它与公检法机关的使命是一样的，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因此，此次《律师法》的修改，对这一点要予以明确，避免多部门多头行使“法律服务”行政许可的情况。

三、增加条款，对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中从事法学教育、研究工作以外的人员违法兼职律师

的行为，应加大处罚力度

目前，这类从事兼职律师人员已不是个别，而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公司经理、公司职工兜里装着一本“律师执业证”，在公司是法人代表，在律所又是律师。这种违法从事兼职律师的行为具有隐蔽性，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难以发现，但所在律所应该是清楚的，是包庇的。

对这种行为一经查实，除了注销其执业证外，应限制其在10年内不得执业，同时，对聘用其律所予以重罚，一人次罚50万元，彻底杜绝这类现象。

四、把“律师进入法庭与检察官享有同等待遇”写进《律师法》，便于各地法院无差别执行

五、明确规范律师向法院申请调查令的执业权利

目前，有的地方已经推行这一做法，并取得成效，社会反响很好。《律师法》的修改要把这一做法吸纳进来，切实解决律师调查难的问题，有利于案件的审理及公正的解决。

六、明确公检法等机关单位，对律师在其场所执业时的人身保护的责任

近年来，律师在法院开庭或在其他场所执行职务时，其人身受到殴打等危害的情形时有发生，这与所在单位保护意识不强，保护措施无力有直接的关系，对此，《律师法》的修改要予以关注。

七、对律师违法执业行为的行政处罚和行业惩戒，追责到其所在律所

律师的执业行为是职务行为，如果律所对律师的违法执业行为一概不承担责任（行政责任）的话，律所就会放松对律师执业行为的管理和监督，不利于律所的严格管理和规范管理，而律所对律师的执业行为不闻不问（有的律师被处罚或处分了主任还不知道），就会直接危害到整个律师行业的管理秩序。

八、明确律协会员资格与执业权利之间的关系

律师必须加入律师协会成为会员，如执业律师执意申请退出律协，或长期不履行会员义务的，应注销其执业证，即会员资格与执业权利挂钩。目前，各地已出现多起案例，应引起重视。

九、明确实习人员取得执业证的政治条件

即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宪法，拥护社会主义的民主法治制度。同时应明确，律师执业后，如果不再具备这一政治条件的，也应注销其执业证，这是加强监管的有效措施。目前，有一些律师具有明显的反对宪法，反对共产党领导，反对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制度的言行，但对其处理处罚缺乏具体的法律依据，这也是造成管理不力的客观原因。

十、明确规定对律师执业权利侵害的救济途径、方式、程序

特别是要有专门机构，专司律师的执业权利救济，无救济便无权利，这样，律师的执业保障问题才能落到实处，而不是停留在纸面上。

十一、吸纳近年来出台的关于律师执业权利保障的相关规定

如六部委的联席会议制度，维护律师执业权利快速处置机制，还包括公安部、最高院、最高检等部门出台的相关规定，以及国务院《关于律师制度改革若干意见》，司法部2016年修订的《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和《律师执业管理办法》中的一些重要的内容吸收进来，上升为法律，增强律师执业权利保障的权威性。

十二、明确司法行政机关对冒充律师行为进行查处的职责

目前，有部分法律工作者，一些从公检法退休的人员，以及社会上一些懂法律的人，冒充律师，宣称自己是律师揽案，以公民身份代理案件，实行

变严格管理没有依据和措施软弱无力的现状。

十五、对于律师协会和律师事务所以外的其他律师组织，如律师联盟等类似组织是否合法等问题要有明确的态度

如这类组织是否需要审批或登记或备案，由哪个机关来审批或登记或备案等等。类似这些组织已经在多地出现，应当加以规范。

十六、严格规范辞职或退休法官当律师的执业范围

法官辞职或退休后当律师的问题已经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一现象会引发两个问题：一是法官辞职直接导致法官数量急剧减少，大量审判人才流失。同时，案件又逐年增加，很多案件不能在审限里审结。二是一些法官辞职或退休出来当律师，利用原来的工作关系和人际关系，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影响案件的判决，严重干扰司法公平。《律师法》规定他们“不能够在原任职法院代理诉讼案件”是远远不够的，他们的影响远远超出他们原任职的法院，况且，他们以其他年轻律师的名义接案、出庭，而整个案件的办理实际上是由他来操作的，包括与法官的疏通等不正当交往。

此次《律师法》的修改，对这个问题必须予以重视，必须与法院的改革相呼应：如规定在五年内不得在本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划内执业注册，并不得在上述地区办理诉讼案件，这样才能杜绝以上存在的问题。

有偿服务，甚至明目张胆到法院附近租办公室招揽业务，这是公然的违法行为，但司法行政机关对此束手无策，因为没有对此类违法行为进行调查取证的法律依据。

司法行政机关作为业务主管部门，应发挥应有的职能作用，移送公安机关予以行政处罚，构成犯罪（如诈骗罪）的，交由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法律责任。

十三、强化对律所对律师的管理，强化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加大其违法成本，纯洁律师队伍

由于长期以来对律师的管理的软松散，导致律师的政治意识淡薄，组织观念不强，自由散漫主义蔓延。因此，必须通过立法来改变和扭转这种局面。一支没有国家观念，大局观念，纪律观念，社会责任不强的律师队伍，难以担负起维护和社会公平正义的使命。

十四、强化律所内部的规范化管理，提高律所主任的任职条件

律师事务所内部管理松懈，不规范，有的小所甚至没有管理，这种管理状态和水平，要提高法律服务的质量很难。因此，必须通过立法来明确，当律所主任不再具备条件时，司法行政机关有权予以注销其职务。同时，一定要疏通好出口，即当律所及律师不再具备执业条件时，要及时予以注销，要降低吊销执业证的条件。全国一年下来没有吊销几个执业证，显然是有问题的。我们必须痛下决心改

新时期的律师协会管理 如何做到“严管厚爱”

周成 湖北周成律师事务所

新时期，各级律协应当强调和进一步明确律师的使命，切实发挥律协的作用。但如何在新时期“严管厚爱”形式下强化和改进律师协会的管理，是各级律师协会的当务之急。笔者就此从以下几个方面谈谈自己的浅见，供大家参考。

明确和创新法律服务的产品类型

全国律协以及各地律协，均根据相应的专业委员会调整并制定了新的操作指引规范，但对于如何进一步明确和创新法律服务产品，仍存在疑问。因此应当明确并创新法律服务产品类型和产品形式。

创新党委政府法律顾问服务

今年6月1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行法律顾问制度和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制度的意见》，9月2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机关召开会议，宣布正式建立法律顾问和公职律师制度。中央办公厅有关负责同志为首批法律顾问和公职律师颁发聘书和证书。

创新企业法律顾问服务

在提供传统企业法律顾问的前提下，针对企业发展紧密联系的、急需解决和面临的潜在法律风险等方面设计新的法律服务产品。律协应在调研归纳的基础上，拟订更加详细的操作指引。

创新商事个体法律顾问服务

为从事商业的自然人提供法律服务，尤其注重对于“双创”企业、大学生创业的服务。

创新基层社区法律顾问服务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推进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决策部署，将公共法律服务网络延伸至基层，让老百姓不出家门解决法

律难题，明确到2018年底前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实现村（居）法律顾问全覆盖，到2020年总体形成覆盖城乡、功能完备、便捷高效的公共法律服务网络体系。

创新法律服务产品形式

法律服务产品的形式可以多样化和新颖化，包括但不限于文本形式、课件形式、宣讲视频形式、网络微信形式以及其他适当形式，比如定制专项服务、非诉业务的模板化等。

强化年轻律师的培养及执业律师的健康保障

近年来，因身体健康问题而去世的执业律师常见诸报端，特别是还有一些是年轻的执业律师，这警醒着我们的执业群体。引起律师过劳死的原因有多种，但是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和习惯是问题的关键。我们的律师到底有多累？据《中国律师网》不完全统计：84%的律师工作超过8个小时；18%的律师甚至每天工作超过12个小时；88%的律师周末需要加班；一半以上的人周末加班超过4小时；10%的人周末加班超过12个小时。真正做到了“客户虐我千百遍，我待客户如初恋。”对此律协尤其应当在关心律师健康方面下足功夫。

律协在培养青年律师方面，要把帮助学生“扣好人生第一颗扣子”作为毕生追求的老师一样，对于刚刚入行的律师（不论是青年律师还是改行新跨入律师队伍的律界新兵），律协要做新执业律师锤炼品格的引路人，做学习知识的引路人，做创新思维的引路人，做奉献法律的引路人。当然，在考虑青年律师生存问题的同时，如何更好地关爱中老年律师的健康问题，也是我们应当考虑的重中之重。

强化和明确“会长坐班制”

张军部长提出的新时期“严管厚爱”形式下，要落实“会长坐班制”。

其一，可以更好地强化行业内的专业导向，从而突出业内精英的重要地位，引领和倡导“业而

优则管”的理念，吸引优秀的律师进入到律协管理层。其二，可以更好地随时、便捷、高效地处理重大突发事件，从而有能力、多角度纠正执业律师的错误理念和执业方法，确保律师行业全面、持续、稳步全面推进和提高。其三，可以更好地引领全体执业律师正确看待当前社会和法治问题，树立正确的法治观念，不回避不绕道，在谋求全体执业律师合法权益最大公约数的前提下，纠正个别律师极端和异化情况的发生。其四，可以更好地引领律师正确看待律师协会与律师制度的完善问题。通过不断推进和改革，把律协打造成为让律师爱戴、信任、可依靠、有温暖的大家庭。

正确认识和明确言论自由的边界

自媒体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家家都是发言人”，甚至出现“人人都是新华社、家家都是中央台”，如何把控和规范执业律师的言论，是律师协会需要慎重考虑和研究的一项重要工作。

常有律师以“自由”职业和法律专家自称，错将《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作为随意发言、随便发言、口无遮拦的依据。甚至出现极个别律师公然诋毁宪法和国家体制，反对社会主义制度，辱骂司法机关人员的情况。还有一些庭外搞行为艺术，恣意贬损律师同行，以“另类”标榜“个性”，以“恶意”解释“边界”。这种行为极大地影响了律师的形象，致使各级党委政府对律师产生误解和判断。这一方面说明我们律师队伍的政治觉悟有待加强，另一方面也凸显律协对会员管理方面的松懈和不足。

对此，我们各级律协必须进一步加强对律师的执业纪律教育，进一步明确律师协会对律师法庭外之“不当”言论的处分权。让广大律师认识到律师执业的根本宗旨是“执业为民”，核心价值追求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职责是“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维护国家利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

律师发表的言论是否适当？是否应当受到行业处分（或者行政处罚），必须先行检视是否以律师的名义或者以律师的身份对外发表。如果一名执业律师发表言论时，仅仅是作为公民（比如小区内居住的律师作为业主或业主代表）所做的发言，即使存在不适当的行为，也不应对其进行处分。因此，在公民身份与律师身份模糊不清时，在认定上有必要从严把握，严格要求。只有在确定律师身份的基础上，方可界定清楚言论的边界，研判其言论是否逾越前述的底线、红线。对逾越者，视其情节轻重，由律师协会依据章程及律师行业规范进行处分或者由司法行政部门依法依规处理。

加强律协管理层和律所管理者的培训

近年来，律师和律师事务所显著增加，律师事务所的内控管理和风险防范也需要结合新的市场环境和行业环境进一步完善和提高。对此，律协应当结合律所管理工作实践，指导并发布律所管理相关的提示和警示，为律所提供借鉴和指导。

加强对律师事务所和律所主任的管理辅导和培训

律师事务所现在良莠不分，很多人（尤其是个人所）出于方便，就贸然成立事务所，没有一点经验可谈。所以，律协应当从律所的内部建设、管理上，对律协管理范围内的律所主任全部进行管理辅导和培训。从律师行业管理上的最基本的管理单位着手，即可将行业整体规范。比如上海律协出台了《律师事务所管理手册》，主要用于指导新开律所相关问题，目前《手册》已迭代至2.0版本，主要针对成熟的律所的精细化管理以及律所之间的合并分立等。

加大对律协管理层的培训

其一，对于刚进入管理层的班子成员要加大培训力度。其二，对于中西部地区的律协管理层要加大培训力度，可以采取“传帮带”的方式，也可以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学习先进地区的经验。

强化律师行业自律

行业自律的重要性

律协作为律师行业管理的自律组织，必须抓行业自律，其重要手段和措施就是行业惩戒，对律师违规行为必须严肃查处，绝不姑息，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严紧硬”。同时，推进律师事业的发展，紧紧围绕“规范行为、维护权益、促进发展”这一主题，充分履行自律服务职能。

强化律协组织内部自律

在律师协会中任职的领导，最重要的是政治责任担当，在个人利益与协会利益发生冲突时，必须以律师协会职务为重。律师协会的理事、常务理事、副会长、会长，都是各级律师协会推荐、择优选拔，要发挥榜样和表率作用，引领广大律师遵纪守法，规范执业。

健全完善各项制度

要积极回应会员的诉求，为全体会员谋福祉，有所作为。切实解决好律协“职责不明晰、履职不到位”问题，健全完善各项制度，已有的制度一定要坚决执行。紧贴会员不同层次的需求细化服务举措，真正把律师协会打造成有公信力、凝聚力、向心力的律师的“娘家”。

“举旗”和“亮剑”并举

维权是律师协会的天职和义务，律师的执业权利受到了侵害，协会就应该旗帜鲜明地维护。惩戒也是律师协会的义务，对违反律师职业规范的行为就应该严厉地处置。惩戒是为了更好的维权，律师协会挺在前面，坚持“举旗”“亮剑”并举。

律师协会要规范行为、维护权益、促进发展。其中促进发展是目标，规范行为是基础，维护权益是保障。维护权益的最根本目的是围绕整个律师行业的发展，律协在推动律师区域发展过程中大有可为，要围绕党委、政府中心工作，促进律师业务发展，提升律师执业环境。



蒋琪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

中国律师行业现在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时代。新时代，律师事业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但也一定要牢记两字——风险。《律师法》第三章中第14-20条是有关律师事务所设立条件和组织形式的规定，如果修法能够健全完善律师事务所的设立条件，将是解决中国律师界风险非常好的措施。

天下不可能无贼，天下也不可能无诉。本文通过系统地研究风险、总结风险，提出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律师事务所的风险控制体系，以期可以降低风险，乃至杜绝风险。



风险的界定

风险是未来一定时间所发生的不确定性结果，包括政治风险、商业风险、法律风险等。什么是法律风险？法律风险是负面法律后果的可能性，可能是由于法律环境发生变化，或是执业主体的不当行为，也可能是业务流程导致的负面法律后果的可能性。律师事务所的法律风险，我总结了六条，即品牌信誉风险、税务财务风险、人才流失风险、客户流失风险、执业行为风险。本文将着重谈谈执业行为风险，即律师执业行为导致的律师事务所风险的研究。

风险的成因

律师在执业过程中有可能产生哪些执业风险？民事风险、行政风险和刑事风险。我们对律师执业行

为风险采用了法律责任的倒推法进行总结，寻找风险的成因。

民事法律风险

我们在司法文书裁判文书网检索关键词“律师事务所”“民事案件”，通过对搜索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近五年内，律师事务所作为当事人（原告或被告）的诉讼案件总数为16161件，包含了一审、二审、再审、裁定；按照案由可以把这些案件分为：第一类合同、无因管理、不当得利的有13678起，第二类劳动争议、人事争议的有309起，第三类侵权责任纠纷有214起，第四类知识产权与竞争纠纷有52起，其他有1908起。这就是律师事务所产生的民事案件风险，作为原告就是被拖欠律师费比较多，作为被告是侵权和违约率比较多。通过对

序号	审理法院和案号	被告律师事务所	判决时间	案情	判决结果
1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01民终11455号民事判决书	广东FZSB律师事务所	2017-09-18	原告和被告签订诉讼代理服务合同，约定“一、乙方接收甲方委托，指派王为民律师为甲方的代理人，参与上述案件的谈判和解、调解，一、二审诉讼、执行。甲方同意乙方可委派律师助理配合完成辅助工作。二、乙方律师应依法保护甲方的合法权益”。起诉时，王为民律师同时向法院递交了起诉书和财产保全申请书，法院立案受理。但由于WWM律师并未在查封、冻结期限届满时办理续封，致使法院执行时无可执行财产。	判决律师事务所赔偿原告上诉人周培元损失5613412.8元及利息。
2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北京市SX律师事务所	2004-12-1	原告WBF之父WSZ委托被告为其遗嘱进行法律见证，遗嘱主要内容是WSZ将其房产由其大儿子WBF继承。律师事务所出具《见证书》确认遗嘱签字行为真实有效。WSZ去世后，因法院认为WSZ所立遗嘱不符合遗嘱继承法定形式要件而无效。由此，WBF所得法定继承遗产比按遗嘱继承少114318.45元，遂起诉律师事务所要求赔偿损失。	判决律师事务所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4318、45元。
3	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2009）宣民初字第00848号民事判决书	北京市YF律师事务所	2009-3-24	因拍摄电视剧与合作方发生纠纷，原告支付20万元聘请了一名律师维权。在签订委托代理协议之后，原告几个月无法联系上代理律师。原告诉称，YF事务所误导原告以变更原本不能履行的合同条款为由，提起诉讼，造成两审败诉。故要求YF事务所退还20万元专项顾问费、赔偿100万元经济损失并向原告书面赔礼道歉。	判决解除合同，律师事务所退还原告专项顾问费40、000元。

表1

其中典型案例的分析，律所承担的违约责任是律师未尽合理合同义务、违反合同条款导致败诉引起的民事责任。侵权责任，是出具的法律文件、虚假宣传侵犯他人名誉权、财产权等引起的民事责任（见表1）。

行政法律风险

根据对网络上公开的2004—2017年律师事务所行政处罚文书数量的统计，行政法律风险主要包括司法部（局）、证监会（局）、税务局、公安部（局）、保监会等行政处罚（见表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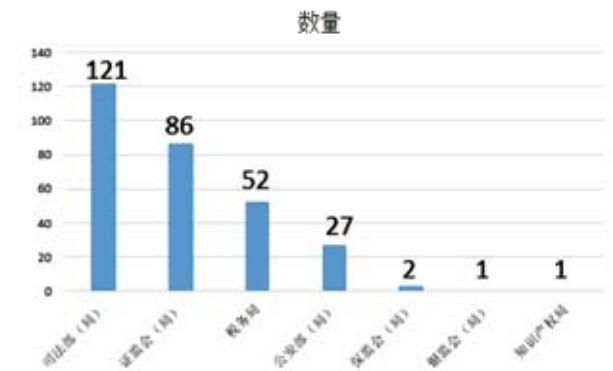


表2（数据来源于威科先行法律信息库）

序号	时间	作出决定的主体	涉事律师事务所	原因	处理结果
1	2017-5-31	证监会	广东GX律师事务所	登云股份IPO申请文件存在虚假记载、重大遗漏，而广东君信未发现登云股份潜在的重大债权债务法律风险，且未发现相关公司与登云股份的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未勤勉尽责。	责令改正，没收业务收入195万元，并处以195万元罚款；对签字律师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5万元罚款。
2	2016-9-01	证监会	北京市ZY律师事务所	在为ZNTC提供法律服务过程中，未勤勉尽责，在进行核查和验证前未编制查验计划；工作底稿不完整；出具法律意见书前的工作未勤勉尽责，导致出具的文件存在虚假记载。	对律师事务所给予警告，没收业务收入60万元，并处以120万元罚款；对签字律师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10万元罚款。
3	2016-11-4	中基协	北京市YK律师事务所	出具的《法律意见书》披露的信息与实际情况不符，包括：主营业务不符；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符；子公司、分支机构或其他关联方不符；实有资本金不符；公司的风险及管理及内控制度不符；公司涉及的诉讼、仲裁等纠纷不符；登记申请材料的真实、准确、完整不符。	依法注销天和融汇的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将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律师事务所涉嫌未能勤勉尽责的有关情况移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进一步查处，并在调查期间停止接受上述律师事务所的法律意见书。
4	2017-4-28	财政部	北京DC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中对所涉3宗土地的土地用途均记载为商业，与上级政府批复的规划用地性质不一致。同时，法律意见书中关于“发行人有权将上述披露的土地为本期债券提供抵押担保”的结论，与事实不符。	财政部致函司法部，请进一步核实情况，依据法律法规、政策规定及行业规范，追究相关律师事务所和从业人员责任。

表3

司法部主要依据《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以及《律师法》对律师事务所进行行政管理，证监会依据《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对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活动进行监督管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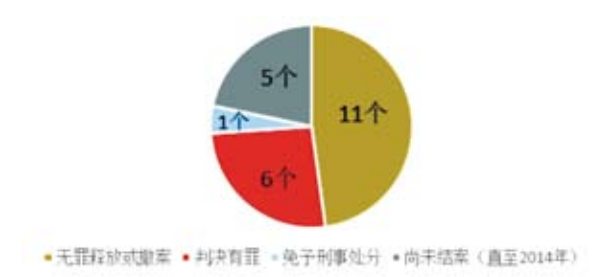
近五年来，证监会对律师事务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774项，对160人实施市场禁入，罚没款累计约132亿元，这其中包括数家律师事务所、数名律师受到证监会的行政处罚。其中，北京市TY律师事务所不仅被没收项目业务收入150万元，更是被罚款750万元，共计900万元。表3是网上公布的其中四个案例的分析。其中，广东GX律所被没收业务收入195万，处罚了195万；北京市ZY律所被没收60万，处罚120万。可见，律师事务所的很多业务流程如果不规范很有可能会引起律师事务所在这个业务领域的灭顶之灾。

行政法律风险还有就是对于律师的行政处罚。根据《律师法》第47-56条的规定，对律师的行政处

罚分为警告、停止执业、没收违法所得、吊销律师执业证书四种。据不完全统计，2017年有17位律师被吊销律师执业证书。律师的行政处罚主因包括两类：一是执业过程中的违法行为导致，二是其他因为律师的个人违法犯罪行为（酒驾、信用卡诈骗、多次盗窃他人财物等）致使律师执业证书被吊销。这些我们都要引以为戒。

刑事法律风险

根据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的统计，从1996年至2014年，律师作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遭受各种刑事指控的已达100余人。据不完全统计，受到刑事拘留、逮捕、通缉、劳动教养、取保候审、定罪、判刑等各种“处理”的律师，则已超过200人。在1997年新刑法实施后，律师执业中涉及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的案件已占全部维权案件数量的80%。2014年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分析了23个涉及这些罪名的案例，结果如下：



律师在执业过程中可能涉及的其他刑事责任还包括：泄露不应公开的案件信息罪、伪造国家机关公文证件罪、受贿罪、诈骗罪、包庇罪、职务侵占罪、逃税罪、虚假诉讼罪等。

下面我举一些典型的律师犯刑事罪的案例。比如“李庄案”，2009年中国重庆市黑社会性质团伙主要嫌疑人龚刚模被起诉，原辩护律师为李庄。检察院以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等罪名对其提起公诉。该案于2009年末2010年初进行了一审和二审，李庄二审被认定犯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2011年4月李庄被起诉妨害作证罪，但最后因证据存疑，检方撤诉。李庄于2011年6月11日刑满出狱。又比如北

京锋锐律师事务所多名律师被刑拘案。锋锐律师事务所擅长“三无式”办案，“表演式”辩护，在庭外组织围观声援、炒作舆论。2016年8月4日，该案在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主任周世锋被法庭认定犯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再比如黑龙江森耀律师事务所涉诈骗5300余万（受害人超5000），已经批捕33人取保候审57人。黑龙江森耀律师事务所自2015年起，通过巨型户外广告、电视和报纸广告对外宣称：官司不赢，分文不收。同时，该所还聘请黑龙江电视台某著名节目主持人为其拍摄广告进行虚假宣传。四名主犯现已以诈骗罪罪、寻衅滋事犯罪、妨害公务犯罪被起诉。目前，此案还在审理过程中。

风险归类

一是争议解决业务类风险。争议解决业务的特点是一般具有明确的程序和法律文书，客户与承办律师的委托代理关系明确，也是律师事务所的常规业务。这类业务的风险识别，包括但不限于如下风险：律师不能很好理解和领会客户诉求和意愿的风险；诉讼仲裁等风险提示不到位的风险；风险代理案件，收费模式约定不明的风险；代理过程中不勤勉尽责，引起客户投诉或赔偿的风险；律师业务水平不精专，代理水平低下的风险；利益冲突、执业限制的风险；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执业的风险；等等。

二是非诉标准业务类风险。我们把非诉业务分成标准业务和非标准业务两种。非诉标准业务包括但不限于IPO、新三板、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保险资金运用、债券发行、上市公司及挂牌公司并购重组等，按照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基金业协会、交易所等监管机关或监管机构的要求，出具尽职调查报告或法律意见书等带有明确指引的律师业务。这类业务的风险识别包括：监管尺度把握不准的风险；操作风险；尽调手段实施不到位的风险；未勤勉尽责所产生的风险；律师、律所资质不符合要求的风险；违反法律法规明确禁止性规定的执业风

险；等等。

三是非诉非标业务类风险。非诉非标准业务即除标准业务以外的具有法律性质的法律服务。这类业务的风险识别包括：客户诉求和业务特点不明确的风险；专项法律服务合同约定不明的风险；律师服务成果载体没有标准的风险；客户或目标标的配合不到位，责任划分不清的风险；等等。

风控体系

我们要降低风险，杜绝风险，就要建立一套完整的风控体系。

首先要建立一套利益冲突的查询体系。每一个律所无论大所、小所、国际所、国内所都应该有一套完整的利益冲突体系。利益冲突体系，可借鉴2004年5月22日通过的国际律师协会《国际仲裁利益冲突指引》。利益冲突体系要建立在全国律师协会《律师执业规范》和各地执业规范的基础之上，要建立符合自己律所行之有效的风控体系。

其次是树立风险意识。我们律师自身应牢固树立法律风险无处不在的意识，这是风控最重要的前提条件；我们还要严格遵守职业道德、执业纪律和执业规范，使我们的执业道路沿着一条规范的道路前行发展；我们还要用法律责任倒推出广泛存在的法律风险，进行详细的研究，并引入到我们自身的执业过程中。

第三是制作风险提示书。各大银行会为客户提供录音、录像，告知客户购买A类、B类或C类产品会有什么风险，律师事务所也应该这么做。风险提示不足不全面往往是造成当事人投诉非常重要的原因。某种意义上讲，风险提示书就是风险的转移书，可以把风险转移到对方或者客户上。律师事务所不光为客户防范法律风险，也要防范自己的法律风险。我们的律师事务所的风险提示书形式是不是完备、内容是不是完善？这个值得去研讨和推进。

第四是法律文书管理。律师事务所要建立合伙人分级审批法律文书制度、立案结案制度以及电子档案与实务档案相结合的制度，做好法律文书的管理，促进执业规范。

第五是建立内核体系。这是律所风控体系最核心的要素。律所一般来说包括业务人员及内核人员，内核体系应该包括内核委员会、内核的流程、内核费用和内核意见等要素，最终内核委员会的意见应是律师事务所内部的法定流程和规范。



最后是建立社会保险保障体系。早在2001年，北京律师协会就为在京注册的律师投保职业责任保险。律师职业责任保险属于职业责任保险范畴，赔偿责任包括三项：一是在保险单规定的期间，被保险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诉讼或非诉讼业务时，由于疏忽或过失给委托人造成经济损失，依法应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由保险公司赔偿；二是保险事故发生后，律师事务所和委托人上访不能通过协商解决，可能引起诉讼，如果在诉讼前律师事务所征得了保险公司的书面同意，那么产生的有关费用由保险公司承担，包括案件受理费、鉴定费、律师费等；三是发生保险责任事故后，被保险人为缩小或减少赔偿责任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保险公司负责赔偿，如抢救费等。其他各省市也有相关的保障律师执业的社会保险措施，例如上海市律师协会早在1998年8月首次在全国正式推出了“律师医疗互助金”试点工作，到目前该项工作仍然继续开展；2014年5月，广东省律协全国率先组织统保重疾险截至2017年3月底，重疾保已理赔63宗，理赔金额600余万元；福州市律协为全体律师投保“律师职业责任保险”和“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等。



粤港澳法律服务业建设背景

迄今为止，内地与香港签署了送达、取证、仲裁裁决执行、协议管辖民商事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婚姻家庭判决的承认与执行五项区际司法协助安排。根据 2016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与香港特区律政司签署的《会谈纪要》，两地还在2017年6月签署了《相互认可和执行婚姻家庭民事案件判决的安排》。内地与澳门签署了送达与取证、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民商事判决承认与执行三项区际司法协助安排。香港与澳门签订了移交被判刑人、仲裁裁决认可与执行两项安排。

数据显示，2012年，广东受理的涉港澳民商事案件数量占全国的4/5^[1]，与港澳开展区际司法协助的数量占全国的“半壁江山”。2015年广东省政府《实施〈粤港合作框架协议〉2015年重点工作》中规定在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前海片区投资的企业可以选择香港法律作为适用法律以及选用香港作为仲裁地。在这一文件精神指导下，深圳国际仲裁院聘请多位香港仲裁员，拥有香港仲裁员总人数达146人。

概而言之，粤港澳法律服务业建设是在上述背景下展开，其中包括创新型法院为代表的司法体制改革、区际司法协助的深入开展、仲裁及警务合作等，在“一国两制”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基础上，以律师合作为代表的法律服务业建设既充满机遇又面临挑战。

粤港澳律师跨区域合作现状

粤港澳地区律师合作，已经开展多年，但是效果泛泛，并呈现出单向性的特点。2003年订立的CEPA及其后的补充协议降低了香港律所设立业务机构的条件，允许取得内地法律执业资格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在内地律所从事非诉讼法律事务，其后将该范围进一步扩大至所有涉及香港居民、法人的民事诉讼代理业务。

[1]张淑钶：《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建设中的法律冲突与法律合作》，载《港澳研究》，2017年第3期。

律师合作视角下的

粤港澳法律服务业建设

唐国雄 涂雨薇 广东国融律师事务所



唐国雄

现阶段，粤港澳律师合作以律所联营为依托，2014年《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律师事务所以与内地律师事务所在广东省实行合伙联营试行办法》以广东省为试点开创了合伙型联营模式，并允许律师事务所分所参与合伙经营。联营是在CEPA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律师事务所以与内地律师事务所联营管理办法》法律框架下进行，并以补充协议的方式不断放宽设立条件。在香港，联营所的设立主要依据香港法例第159章《法律执业者条例》第39C条规定。

2017年1月，司法部发布《关于发展涉外法律服务业的意见》，其中明确提出坚持在CEPA及其补充协议框架下，实施内地对香港、澳门的各项开放措施，加快落实合伙联营律师事务所试点工作，进一步加强香港、澳门律师事务所与内地律师事务所的业务合作。2017年9月26日广东省委深改组审议通过了《发展涉外法律服务业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要“复制推广粤港澳合伙联营律师事务所”，“积极实施内地对香港、澳门各项开放措施在广东的先行先试，推动粤港澳律师事务所合伙联营和协议联营发展”，为今后法律服务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政策支撑。

粤港澳跨区域法律服务业建设的难点

粤港澳跨区域法律服务业仍然处于初级阶段，至今无法快速推进的现实原因主要包括：一是体制方面，港澳地区经过了漫长的殖民地时期，在法律制度、司法体系等方面已经深受殖民国家的影响。以香港为例：“包括普通法、衡平法和制定法在内的英国法律及其司法运作方式源源不断在香港加以适用……历经150年的发展变迁，香港的法制及其法律文化传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完全融入了普通法系的行列，成为带有东方特色的普通法通行的区域”^[2]，回归以后，在“一国两制”基本国策之下，港澳地区原有的司法体系也基本得以维

持；二是文化层面，在港澳均超过100年的被殖民时期内，已经历经了几代人口更迭，现在的香港（澳门）人，很多是混血后代，他们对大陆法律文化和司法体制的接受度都比较低。以下仅就粤港澳律师跨区域执业的制度困境加以分析。

首先，对教育背景要求不同。内地对律师没有专业教育的硬性要求，很多业内律师是自学通过司法考试并取得律师执业证书。显然，在律师的法学教育背景方面，香港的要求比内地高很多，不止有专业学习年限的要求，还细分为理论教育与职业教育两个部分，同时对前置教育的成绩要求较高。

其次，对执业经验的要求不同。内地对律师执业的实习期统一为1年，通常在这1年的实习期内，要求实习律师参与办理的案件不少于一定数量，参加律协组织的集中培训并完成考核。香港要求大律师1年及事务律师2年实习期，主要是因为事务律师的从业范围比较广，所涉及的实体法律与程序内容比较多，因而对实习期限的要求较大律师要高。

再次，律师分级制度不同。香港的律师制度承袭英格兰传统，分为律师（solicitors，又称“事务律师”）和大律师（barristers，又称“讼务律师”）两个分流。律师提供一般的法律服务，例如楼宇买卖及按揭、草拟商业文件、公司上市等法律问题，也有一些提供较专门的法律服务，如关于航运和知识产权等法律问题。律师也提供诉讼方面的服务，但他们只能在裁判法院、区域法院及高等法院的内庭聆讯中代表当事人。大律师的服务范围主要是提供与诉讼有关的服务，可分为三类：1. 在各级法院作为当事人的代表律师，进行诉讼及辩论；大律师可以出席各级法院的聆讯，并在高等法院和终审法院享有唯一的出庭发言权；2. 根据当事人的指示草拟与诉讼有关的法律文件；3. 透过律师向当事人提供任何方面的书面法律意见。当事人不能直接聘用大律师，必须由律师转聘。由于大律师是诉讼方面的专



才，而且是个人独立执业的，这种转聘制度亦保障了大律师在提供服务时的客观性和独立性。

律师和大律师的工作性质和范围，甚至训练和专业守则皆不相同，但并没有高低从属的关系^[3]。内地的律师分级管理制度还在试点阶段。

总体而言，在内地从事律师职业的门槛比较低，与律师从业相关的规定也较为笼统，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法律传统以及司法体制的不同，律师从业的市场成熟度也有较大差异。当然，内地与香港对律师执业的要求不同，并不能推导出内地律师水平较低的结论，而是应该看到融合和借鉴的空间，提升两地律师的专业水平。

最后，律师保障不足。既然要开展跨区域法律服务，那么就必然要“保障先行”。在新一轮的司法体制改革中，法官权利保障被广泛关注，而律师则停留在“为权利而斗争”的阶段，尤其是在刑事司法领域，正如陈瑞华教授所言“书本上的刑事辩护制度是一回事，实务中的辩护形态则是另一回事”，除了职业权利以外，律师在执业过程中的人身权利保

障也有所缺失，从“律师在法庭被打”、“律师遭遇法警滥用强制手段”等新闻可见一斑。仅就律师执业保障而言，粤港澳区域律师合作面临两个问题：

第一，内地律师执业保障的不足。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司法权威性不高的情况下，内地律师职业尊严和执业保障水平，远不如港澳律师。第二，没有跨区域律师执业保障的相关规定。如何处理跨区域合作中特有的问题，保障律师的职业权利，我们没有与之对应的规定，也就是“无法可依”。

粤港澳律师合作的路径与选择

扩大跨区域律师合作范围

例：2016年，甘某（香港籍）任法定代表人的中山市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受到中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理，责令其限期支付员工工资。甘某并未在处罚期限内支付员工工资，中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将此案移送中山市公安局，后由中山市公安局立案侦查。2017年4月，甘某因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被中山市第一人民

[2]叶秋华、李温：《论“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法制及其启迪——纪念香港特区成立十周年》，载《法学家》，2007年第3期，第9页。

[3]陈弘毅著：《香港法概论》，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11年版。

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并处罚金^[4]。有期徒刑执行完毕之后，甘某即返回香港。

此案件中存在“两法衔接”^[5]的问题，直接导致了在刑罚执行完毕之后，行政处罚被搁置，虽然甘某受到了法律处罚，但被拖欠工资的员工利益依然没有得到救济，这里就有存在司法制度的空白，也就是律师服务发挥作用的空间。

实际上，随着粤港澳地区司法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区域律师合作有更多可发挥的空间，包括刑事司法合作下的律师合作等领域可以进行探索。

完善配套措施

完善司法制度

法律服务业的完善始终有赖于司法制度的完善，诸如律师职权范围、律师执业程序性保障等内容，都不是行业建设能够解决的问题。粤港澳区域性司法合作的课题之下，制定针对性的规范并加以适用，是律师合作乃至法律服务业建设的基础性保障。

发挥律师行业协会的作用

律师作为高度专业化的职业，律师行业协会在行业管理、行业自治以及职业保护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粤港澳大湾区的法律服务业建设，同样需要粤、港、澳三地律师行业协会的协同与交流，这既有利于跨区域律师管理，又能够为律师跨区域执业与合作提供必要的帮助。

探索多样化的律师服务方式

1. 服务业外包形式。港澳地区从特定概念上来说，属于“域外”，因而可以探索“离岸服务业外包”的服务业通行模式，合作并不意味着要一把抓，通过服务外包的形式将专业工作交给擅长的律所或律师，是更广阔意义上的法律服务合作。2. 法律顾问形式。事实上，法律顾问的服务形式由来已久，无论是涉外还是港澳台区域都早已有相关规

定，如《司法部关于开展国内律师事务所聘请外籍律师担任外国法律顾问试点工作的通知》，广东省《关于省内律师事务所聘请外籍律师担任外国法律顾问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通过聘请法律顾问到律所的工作方式，能够为律所在跨区域服务时提供交流的便利，亦能提升法律服务及合作的效率。

完善律师遴选制度及执业保障

“司考”改“法考”，意味着法律职业的专业化要求越来越高，那么就有必要提高律师执业的门槛，具体来说包括两方面，一是增加对法学专业教育的要求，同时细分为理论教育和职业教育两部分；二是在资格考试中加入实践要求。将律师行业准入置于粤港澳司法合作的背景下考虑，还有必要增设跨区域合作的培训要求等。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可以探索从律师中遴选初任法官、检察官等机制，拓宽律师职业的发展方向。

2017年4月26日，司法部首次举办新闻发布会，通报保障律师执业权利工作。律师的执业权利包括：受案权、会见与通信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知情权、申请权、申诉与控告权、辩护权等^[6]。其实仅就规范而言，律师执业保障已经日趋完善。但是实际操作上面临的问题仍然难以解决，笔者认为，针对实际问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完善：一是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确立律师服务业属于整个司法体制建设的重要部分而非与之相对立；二是畅通权利救济途径，法谚有云：“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仅有保障性条款显然不足以扫清律师执业过程中的种种阻碍，还要为律师提供权利救济的途径，并令其实际可行；三是矫正律师与公检法机关关系，之所以实践中律师执业权利难以保障，缺乏相关机构和人员的配合是重要原因，因而要从关系改革的根本层面切入改革。

中国仲裁国际化及律师在商事仲裁中的角色

——以深圳国际仲裁院国际化创新实践为视角

刘晓春 深圳国际仲裁院



深圳国际仲裁院六个“国际化”创新

治理结构的国际化

2012年，深圳市通过特区立法颁布了《深圳国际仲裁院管理规定（试行）》，深圳国际仲裁院（SCIA）成为中国首个引入法定机构管理模式的仲裁机构。法定机构管理模式，指的是以理事会为核心的法人治理结构，即理事会是深圳国际仲裁院的决策机构，所有重大的决策决议都由理事会通过。理事会下设执行管理层，有效实现了决策、执行和监督的相互制衡，更好地保障了仲裁的公正性和独立性。《深圳国际仲裁院管理规定（试行）》规定深圳国际仲裁院至少三分之一的理事须来自境外，以避免可能的地方干预、行政干预及内部人控制等弊端。目前SCIA的理事会成员来源非常国际化，第一届理事会（任

期2012—2017年），12名理事中5名来自境外，去年理事会成功换届，第二届理事会成员任期是2017—2022年，13名理事中7名来自境外，国际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并且吸纳了来自国际组织和国际机构的资深人士，比如赵宏女士是WTO上诉机构的大法官，João Ribeiro是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主任。

仲裁员结构的国际化

从1983年成立以来国际化创新一直融入在SCIA的血脉中。1984年，SCIA开创中国聘请境外仲裁员的先河，第一批聘请的仲裁员一共14名，就有8名来自香港。到现在，SCIA共有870名仲裁员，来自5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353名仲裁员来自境外，占比高达40.6%，是中国所有仲裁机构中境外仲裁员占比最高的仲裁机构。仲裁员结构的国际化，更好地保障和助

[4]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6）粤2071刑初2548号。

[5]“两法衔接”全称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机制。

[6]邱兴隆、邢馨宇：《审前程序中的律师权利及其保障与实现（上）》，载《法学杂志》，2017年第7期，第67—74页。

力“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法律服务。

业务结构的国际化

深圳国际仲裁院不仅仅提供仲裁服务，还推出了两种多元化的仲裁解决模式，即“调解+仲裁”及“谈判促进+仲裁”。这两者有两个区别，第一是前者要判断产生的争议是不是真正有纠纷，有纠纷才进行调解；后者是并没有发生纠纷，而是各方当事人陷入僵局，就需要利用谈判促进的平台和机构平台帮助各方当事人进行斡旋，从而更好的达成调解、和解。第二个区别，前者的调解是从法律和事实的角度引导当事人帮助当事人调解纠纷，后者的谈判促进更多地考虑商业层面，考虑交易本身，平衡各方当事人的利益，从而达到多赢的结局。

下面简单介绍“调解+仲裁”的仲裁解决模式中的“展会调解+仲裁”和“四位一体”的纠纷解决机制。

2007年，由中国商务部指定，深圳国际仲裁院作为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唯一仲裁调解机构，解决国际贸易合同纠纷。2007年到2017年，十年间在展会期间成功地帮助调解了多宗外方和中国参展商达成和解，创新了“展会调解+仲裁”的模式，与广交会合作设立了“中国国际经济高新技术成果权益保障中心”，解决高科技和知识产权纠纷。

2013年深圳国际仲裁院与深圳证监局、深圳证交所共同发起设立了深圳证券期货业纠纷调解中心，是我国资本市场第一个紧密结合专业调解、商事仲裁（诉讼）、行业自律和行政监管功能的“四位一体”的纠纷解决机构，为中小投资者提供免费纠纷调解服务。调解中心创新合作模式，推动健全调仲对接机制。深圳国际仲裁院受理的资本市场纠纷仲裁案件，如双方当事人同意，机构或仲裁庭可引导当事人向调解中心提交调解申请。当事人经调解达成调解、和解协议的，任何一方当事人可依据调解、和解协议中的仲裁条款，申请深圳国际仲裁院按照协议内容依法快速作出仲裁裁决，使得协议内容具有可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

再分享“谈判促进+仲裁”的仲裁解决模式。这个模式非常新颖。2015年，深圳国际仲裁院受理并解决了一宗中美跨境投资纠纷，争议金额达134亿元人民币，为中国有史以来金额最大的仲裁案件。大部分的仲裁案件是根据合同中已有的仲裁条款提起仲裁，而涉案合同并无仲裁条款，争议发生后，中美两国当事人基于对深圳国际仲裁院的信任，共同协商指定我院组成独任仲裁庭仲裁。此起仲裁案件当事人和代理律师分别来自中国、美国、新加坡、苏格兰和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等不同法律背景的国家 and 地区。深圳国际仲裁院首先进行谈判促进，充分体现了当事人自治原则。此案案情复杂，专业性强，来自中美两国多方当事人分歧巨大，经过6天谈判成功促成双方达成和解协议，随即把和解协议对接仲裁，第7天做出裁决书，仅13天便高效完成仲裁，为一裁终局，避免诉累，且根据联合国《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可跨国执行。中美两国当事人对最终的解决方案都表示高度满意。这是SCIA对于谈判促进对接仲裁的一次探索和尝试，非常成功。有业内人士分析，该案的圆满解决关键得益于深圳国际仲裁院的国际公信力，我想这与深圳国际仲裁院独特的法人治理结构和国际化水平密切相关，也增强了外商人士境内经商的信心。

2016年，SCIA设立了深圳国际仲裁院谈判促进中心，具体履行谈判促进职责。谈判促进中心设立后可以说成果满满，在2016年底与罗湖区委共同启动了深圳市城市更新与棚户区改造谈判促进机制，其中，罗湖“二线插花地”棚户区改造项目，被媒体称为“中国棚改第一难”，涉案金额714亿，涉及户数33700户，谈判促进机制为破解谈判难题，为高效推进城市更新和棚户区改造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仲裁裁决执行的国际化

1988年，SCIA开庭审理广东粤海进出口公司诉香港捷达公司一案，1989年6月作出裁决，但是香港捷达公司并没有主动履行，案件被提交到了香港高等法院进行裁决，当时成功被香港高等法院依据《纽约公约》予以执行。这也是载入史册的案件，



2017年3月29日，中非联合仲裁深圳中心揭牌

因为这是中国内地仲裁裁决首宗在境外获得承认和执行的先例，同时也是香港法院按照《纽约公约》执行仲裁裁决的先例。2014年，SCIA的仲裁裁决在香港获得执行的数量占全国所有仲裁机构的38.5%，为全国最高，也高于香港之外的世界任何一个仲裁机构，这样看来，深圳国际仲裁院在仲裁裁决的执行力方面还是很有保障的，相信这个方面能够给当事人选择SCIA仲裁时获得信心和认可。

仲裁合作平台的国际化

深圳国际仲裁院立足深圳，走向世界。SCIA和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中非联合仲裁中心、中欧国际仲裁中心、ICC、跨国投资与法律培训中心等多个境外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也创立了合作平台。在去年的11月份，深圳国际仲裁院还率团访问了非洲，并且与毛里求斯商会仲裁调解中心签署了合作协议。

仲裁规则的国际化

2016年12月1日，深圳国际仲裁院出台了最新版的仲裁规则，同时推出《关于适用〈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的程序指引》《海事物流仲裁特别规则》《网上仲裁程序特别指引》《谈判促进规则》，与新规则相配套，从而形成了完整的规则体系。最新版仲裁规则，是受理国际投资仲裁的首部中国规则，也是内地首先制定适用《联合国

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的程序指引，被香港视为默认仲裁地，为将来受理国际仲裁案件奠定基础。新版的仲裁规则，同时突出了“当事人中心主义”的理念，强调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考虑当事人在仲裁时间和费用管理上的需要，营造公平公正的仲裁氛围，反映了仲裁实践的最新发展和业界的需求。

律师在商事仲裁中的作用

律师在商事仲裁中大有可为，可具有几重身份。第一是代理人，深圳国际仲裁院受理的全部案件约80%的案件均由律师作为代理人。第二可作为仲裁研讨会的参与者，比如在华南企业法律论坛，律师参与热点问题的研讨。第三可以担任仲裁员或调解员，从我国仲裁员名册的信息来看，中国内地的仲裁员总人数是517名，律师占38%，占比非常高；调解员的占比更高，219名调解员，将近半数是由律师构成的。第四，律师还可以担任专委会的专家，目前深圳国际仲裁院成立了创投专委会、保险法专委会、融资租赁专委会和PPP专委会等，未来还会成立更多的专委会，满足仲裁业务的需求。

目前深圳国际仲裁院已经正式的跟深圳市仲裁委员会合并了，这将更好地打造国际仲裁的中国高地，实现优势资源的强强联合。



互联网科技的飞速发展对于律师行业带来激烈的竞争，这种竞争将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竞争发生在均未掌握互联网技术的律师与律师之间、律所与律所之间；第二阶段的竞争发生在作为人的律师与作为机器的人工智能之间；第三阶段的竞争将重新回归到律师与律师之间、律所与律所之间的竞争上来。

第一阶段是初级阶段，表现为低端的价格战；第二阶段则是发生在掌握了互联网技术的律师/律所和未掌握的两类群体之间，前者将对后者进行无情的杀伐，这种杀伐的惨烈甚至到了屠戮的程度。麦肯锡环球研究所2017年初发表报告指出，现时律师事务所有大概百分之五的工种，可以完全用科技代

劳，而德勤（Deloitte）于2016年公布的一项研究则预计，未来20年法律行业有超过近四成的工作岗位有随时被机器淘汰或取代的可能^[1]。我们现在正在进入和经历这个阶段。第三阶段则是在普遍掌握互联网技术态势下的高级竞争阶段，这一阶段和第二阶段难以严格划分，将同时伴随着律师行业旧有秩序的破坏和新秩序的构建。

纵观三个阶段的竞争，全部发端于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面对这个趋势，法律界应该认清其优势和局限，利用这些新技术提升业务效率。同时，更要深度思考这种变革对行业带来的秩序重组，“有备则制人”，早著先机，在新时代的背景之下为2020年之前

的“小康”决胜阶段法治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法律服务消费（选择）模式的转变

马云曾经说过的：我们用十五年的时间让中国人习惯了互联网和互联网交易。当下，我们越来越深切的感受到这种变化遍布我们周遭的任何一个环境之中。

相对于传统商业领域在互联网技术驱动下早已出现的B2B、B2C等商业模式，法律服务领域的消费（选择）模式的转变，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并呈现出一个特点。三个条件分别是：1、有习惯互联网消费的市场主体；2、该类消费主体具有相应的市场支付能力；3、法律服务可以商品化（初期是产品化）并且可以通过互联网议价。其应该呈现出的特点是后期的发展速率远超前期。以下分别论述：

有习惯互联网消费的市场主体

当下，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网民国”，国家统计局2017年10月30日发布的《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分析》指出：截止2017年6月，互联网普及率为54.3%，网民规模接近8亿人^[2]。具体见下表：



图一

以上我们可以看出，在中国，规模庞大的网民数量本身就是一个人人们习惯网络消费的明证。

该类消费主体具有相应的市场支付能力

进入新世纪以来，尤其是伴随着全球化程度和

国民收入的提高，我国已经有相当规模数量的网民在消费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且消费量级呈飞速增长趋势。由下图一度曾经达到的70.20%的增长幅度即可管中窥豹。



图二

这种趋势明确昭示着：有支付能力的消费主体正在形成规模，而且规模越来越大。这成为互联网经济得以飞速发展的支撑点之一。

法律服务商品化并且可以议价

法律服务行业与传统服务业尽管存在众多不同之处，但就本质而言，还是向委托人/客户（传统商业模式中的买家）提供服务，而这种服务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被作为商品在出售。伴随着5G时代的即将到来，信息交换的速度大幅提升，透明度也与日俱增，导致在提供这种商品的服务的过程中，委托人/客户（买家）的议价能力越来越高，从律师提供服务收取费用模式由按时收费到固定收费到最高收费的转变可见律师能够提供的法律服务越来越多的被当做一种商品在出售，甚至有人断言，商品化是法律服务的唯一出路^[3]。

尽管关于商品化是法律服务的唯一出路的论断尚有待时间的进一步考证，但毋庸置疑，商品化和议价能力的不断提高在大数据时代已经是一种必然。这就要求，在服务模式的提供上，法律服务亦

[1]摘引自香港律师会会长苏绍聪先生2017年10月20日在两岸四地青年律师论坛开幕式上的讲话。

[2]数据和图（一）来自：国家统计局，CNNIC、中商产业研究院。

[3]摘引自香港国际仲裁中心荣誉主席、香港通讯事务管理局主席王桂壠在2017年10月20日两岸四地青年律师论坛上的演讲。

应遵守这种规律。

科技驱动下法律服务（选择）模式的转变呈现出的特点
透过上述图（一）和（二）的分析可以看出，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互联网经济仍会保持较高增速，且呈现出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及越往后期增速越快的特点。

所以，我们清醒的认识到：法律服务（选择）模式改变必将伴随着法律服务商品化的进程而逐渐加剧。

法律服务（提供）模式的转变
法律服务（提供）模式转变的呈现
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之一是需求决定供给。商品化的法律服务同样要遵循这种规律即消费（选择）模式的改变势必带来或倒逼法律服务（提供）模式的改变。

客户或买家通过互联网提出法律服务消费（选择）需求，服务提供者只有透过同样路径提供服务才是正确的响应姿态，这就是法律服务（提供）模式的转变。这种转变应该具备的条件包括：1．大数据的存储；2．信息传递或者交换的即时性。而这两点要么是人工无法做到的，或是人工的效率和人工智能的效率无法比拟的，要么就是机器可以做得更好的。所以，在一定领域或者层面，科技的发展必然带来人工智能对人类劳动的取代。这是已经呈现出的科技发展带来的法律服务（提供）模式的转变。

在明了服务（提供）模式的转变成为一种必然之后，接下来需要厘清的概念则是，这种转变到底会发生在何种领域或者层面。

服务(提供)模式转变最先发生的领域
前文我们引用了麦肯锡和德勤的研究数字，但笼统的比例使我们对人工智能到底在什么样的程度上取代人类的认知并不清晰。为此，我们有必要借用《美国法学院的第一课》中的“法律三个层面

理论”来进行一下分析^[4]。

法律三个层面理论大致可以描述为：对任何有关法律的思考，都要从Level 1、Level 2和Level 3三个层面出发。Level 1指的是一个案例里最表面的分析——案情（facts）、争议点（issue）、判决（holding）、理由（analysis/rations）；Level 2则是一个判决背后正反两面更深层的思考；Level 3则是从哲学层面，关注一段时期内所有判决背后体现出来的整个思考流向，甚至涉及了社会在一定时期最主流的价值判断。

在觉醒的人们普遍思考律师的工作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人工智能取代的时候，最通常的反应是：Level 1层面的工作必定最先阵亡，甚至逐渐消失，Level 2并非不可替代，但难度较高，Level 3则代表了技术发展的极限，是不大可能被机器替代的。现阶段这种认识应该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不可证伪性。基于此种建构，服务（提供模式）的转变必定应针对Level 1来进行布局和谋划。

在此领域，人类面临巨大挑战，且几乎无战胜的可能。

律师行业秩序的重建
全国律师行业呈现出的旧有秩序或现有秩序
就全国范围来看，律师行业的旧有秩序，不外乎呈现出以下特点：

1．政治、经济、文化发达地区律师行业发展领先或较为领先，创富能力或吸金能力较强，比如北、上、广、深地区；2．具有或享受国家特殊政策区域律师行业发展机遇更多或潜力更大，比如粤港澳大湾区；3．全国性甚至全球性知名大所在某一领域的市场集中度或某一业务领域的垄断程度较高，比如大成、金杜；4．受尊重的行业性领军人物在律师行业具有超高影响力和行业号召力，但往往年龄较长，多为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甚至更大年龄

段的人物；5．无论从全国层面分析还是区域层面考察，规模性大所对一般性中小律所的市场挤压和业务碾压程度剧烈；6．就个体律师而言，年龄越大、资历越深，行业地位越高，但往往需要漫长岁月的历练；7．律所、律师行业大多在业务上强调创新但在文化方面往往过多强调传承，而较少青睐创新。

科技驱动将带来的律师行业的新秩序和对行业的影响
如果律师行业的发展一直处于前述第一阶段，那么，行业的变革将会是缓慢的，但是科技发展的驱动则会加剧这种变革，使得趋势越来越剧烈。

在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竞争将会对律师行业的旧有秩序造成破坏甚至是颠覆，呈现出的特点可能除对上述旧秩序的第1和2条无法改变或改变较小之外，对其他要素都会发生程度不同的冲击，譬如对旧有秩序的3—6条都会重新构建且呈现出如下特点：

由于对大数据的普遍应用，一批中小律所适应科技发展，部分大所将逐渐丧失在行业的垄断地位，客户由专用大所转至分散用中小型律所，这可能带来大所的覆灭和中小律所的异军突起，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多是：其一，事务所的引领者没有意识到变化的到来；其二，虽然意识到变化但对其到来的速度没有准确的认知；其三，认知到变化的到来和到来的速度，但认为不会影响自己和自己律所在行业的地位、在市场的影

随着学习能力的下降，受尊重的行业领军人物不能适应行业发展或未准备好接受变化，导致以更快速度退出历史舞台，有建树的青年律师领军人人才迅速崛起；

就律师个体而言，年轻一代思维更活跃，接受新技术、新思想能力更强，在专业、职业、行业中树立地位可能性更大，但时代不会给年轻人更多“熬”的时间和机会。

由于科技的发展，带来律所、律师行业文化

产生变化，在律所文化的传承——“传其道，承其志”之外，更多接受“谋未来”的冲击和动摇，创新的因子将在未来越发地活跃且日益产生较大的能量“撕破”原有的格局。

对法律服务业革命应持有的正确的态度
任何秩序的重建对时代来讲都是必然的，对当下的人来讲是一种挑战。善于把握历史机遇者会欣然接受甚至追逐这种变化，随波逐流者要么是拒绝接受变化，要么是恐惧迎接未来。

面对着汹涌的变革大潮，律师行业正确的应对措施应该包括：

认知新时代
十九大之后，进入新时代。政治、经济新格局正在形成，并且不排除会在某些行业发生剧烈变化，应密切关注时事政策，认知新时代，树立新观念，准确判断未来，避免方向性错误。

掌握新技术
新技术层出不穷，应用领域越来越广泛，对行业影响越来越深刻，以技术驱动的法律服务业革命，是以大数据为核心的知识革命，这次革命，淘汰的不是工具，是人^[5]——不愿学习、不能获取新技术的法律人。

布局新业务
跨境、跨界经济，共享经济，融合经济等多种经济形态的蓬勃发展；所有权制度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等多种改革措施并举。这一切，都在为律师行业创造着新的领域，善于把握商机，敢立潮头者应精心谋划，布局未来。

这是一个极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极坏的时代，只看人们如何选择自己的未来。拥抱变化，迎接未来才是应时、应势而动，尽管律师行业天生是一个相对较为保守的行业，但这却不是拒绝变革的理由。

[4]2017年11月3日，赵丹喙，耶鲁DJ\纽约律师《到底砸谁的饭碗》，载《到底砸谁的饭碗？纽约律师眼中的法律人工智能【斑斓·AI】》。

[5]摘自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陈春花教授在2017年10月11日举行的“知识革命将淘汰什么样的企业和企业家”的演讲，载2017年10月23日微信公众号“春暖花开”。



龙雄彪 湖南真泽律师事务所 刘谦 法狗狗（深圳）科技有限公司

龙雄彪

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对于促进社会发展、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和社会稳定性，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依法治国战略的实施，全社会的法律意识日渐增长，对建设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需求日益迫切。如何为我国人民提供更健全和完善的公共法律服务成为政府机关和法律服务行业的探索目标之一。

与此同时，势态迅猛的人工智能技术在扩大产能、提升效率、替代人力上潜能巨大。因此，在人工智能的附能下，公共法律服务行业的覆盖面和服务质量能否得到质变的提升是研究与实践的探索方向。

公共法律服务的发展

公共法律服务概念的提出是为了维护法治最根本的公平性，消除因为阶级、文化、经济、社会地位的不平衡造成民众在获取公平正义上的失衡。

中国社会的法律需求日益增长，法律服务市场供需紧张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确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目标。依法治国成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方针之一，体现出中国社会对法治建设和法律服务

激增的需求。

这一需求源自经济和社会进程的迅猛发展。党的十九大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判断，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随着依法治国战略的全面实施，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的法律意识逐渐攀升，越来越多人开始运用法律维护个人权益。据最高人民法院数据统计，2016年全国法院共受理案件2305.6万件，2015年全国法院新收案件近1800万件，同比增幅接近2014年的3

倍。即2016年我国涉诉人群至少有4611万。考虑到14亿百姓中没有走进法庭以及没有进入司法程序的法律纠纷，我国人民对法律服务的实际需求远不止这个数字。法律服务行业悬殊的供需关系让建设更全面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刻不容缓。

我国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发展与限制

传统的公共法律服务责任主体和服务提供主体常被混淆——公共法律服务的提供主体是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但法律服务则由政府部门直接提供。提供主体和供给方式的单一化，不符合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进程，导致服务人力资源很难有效整合调动，服务规模、质量和效益很难有效提高。各地公共法律服务建设普遍存在以下两个问题：一是专业人才不足，素质参差不齐；二是结合前沿科技的信息化建设水平较低。

造成人类现代文明发展的根源在于科技变革。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体现出与人工智能结合已经成为各行业发展主要方向之一。司法部在2017年7月12日印发的《“十三五”全国司法行政信息化发展规划》中，明确指明“信息化已成为创新驱动发展的先导力量”，提出要“促进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与司法行政工作的深度融合。”人工智能技术究竟是什么？它与法律服务行业的结合，能否为我国当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带来长足的进展？

法律人工智能技术与架构

人工智能技术

人工智能自阿尔法狗与李世石的一盘棋走入大众眼帘，成为热议的新兴前沿科技。但这已经是人工智能掀起的第三次浪潮，前两次分别是1962年IBM的西洋跳棋程序战胜了盲人跳棋高手，1997年IBM的深蓝战胜国际象棋选手卡斯帕罗夫。但到2016年的围棋之战前，人工智能的热潮都只维系了短暂的寿命。根本原因在于技术无法在实际应用中落地。

此次浪潮与之前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人工智能技术

可以触达普通民众的生活，不再仅存活于研究报告和空想里，而可以在多个应用领域表现出可以被普通人认可的性能或者效率，可以在产业界发挥价值。

科技部高新司司长秦勇分析说，“经过此轮人工智能的起伏，国家看到了该领域成为新经济增长点的潜力，也认为它能促进新旧动能转换，才把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上升到一项战略任务的高度。”

人工智能技术与法律的结合

人工智能技术在于法律服务行业结合中，最常见的应用是通过大数据分析和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提高法律工作者的工作效率。然而，这种应用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现存的供需差。如何从源头解决人民日渐增长的法律需求才是最重要的探索方向，即让法律人工智能成为提供法律咨询的工具。

法律行业因其严谨的逻辑为人工智能的知识图谱建设提供了温床，但法律咨询对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高要求又在极大程度上拔高了实现难度。自然语言是指人们日常使用的语言，如汉语、英语、法语等。自然语言处理是计算机科学领域与人工智能领域中的一个重要方向，它主要研究能实现人与计算机之间用自然语言进行有效通信的各种理论和方法。知识图谱是一种揭示实体之间关系的语义网络，可以对现实世界的事物及其相互关系进行形式化地描述。知识图谱给互联网语义搜索带来了活力，同时也在智能问答、大数据分析 & 决策中显示出强大威力，已经成为互联网基于知识的智能服务的基础设施，成为推动人工智能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之一。

知识图谱与法律服务业的结合有两种常见形式：

第一种采用自顶向下的方式，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来挖掘、分析、整理法律知识体系中的知识资源，构建一个可以为法律工作者提供切实的、有价值的参考的法律知识图谱。通过可视化法律知识图谱，法律工作者能够高效找到所需要的知识。

第二种采用自底向上的方式，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来挖掘、分析、整理百姓咨询的法律问题，构建一个法律需求知识图谱，获悉广大群众的法律需求。

本次AI浪潮中最热门的莫过于机器学习。自然

语言处理和知识图谱构建以前都是基于人工去编写规则和逻辑，随着知识资源的扩大突破了人力的产能边界，这时机器学习就派上了用场。通过目前比较流行的CNN、RNN、LSTM、Bi-lstm+CRF等机器学习模型能够很好的解决产能问题。

法律人工智能产品功能

目前国内最前沿的法律人工智能咨询产品能做到以下三点：

一是智能法律问答。以法律条文和用户咨询的问题作为知识源，通过自然语言处理和机器学习引擎对知识进行整理和规整，形成一个智能系统。用户问问题，系统能够给出对应的回答，从而达到专业回答多次利用的目的。

二是大数据案情预测与证据采信率预估。有多年经验的法律工作者能凭借自己的经验对一些案件进行预测。人工智能可以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把裁判文书拆解成的知识原子，通过特征工程把知识点整理成机器能识别的数据，再通过大数据训练，机器学习模型能够给出精确的案情预测结果。同样的，人工智能还可以帮助用户判断收集哪些证据更容易被法院采信。

三是专业行动指南。解决法律问题需要付诸实践，如果涉及多种行动方案，即使是法律工作者自己，也难以评优。但人工智能可以做到。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挖掘判决书案情因素和行动对策以及最后的判决结果，让机器学习模型训练，从而达到给用户最优行动的指南的目标。

法律人工智能与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结合的架构设计

如何构建一个完整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是当前政府和法律工作者热切想要解决的问题。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现在基本上人人都有手机，公共法律服务可以从这个特征入手，也就是说用户通过手机就能进行法律咨询，这是目前推广最高效也是最低成本的方式。同时，兼顾到那些不太会用手机的人群，和考虑到用户为了公信力会去专门的政府机构咨询，可以在政府咨询机构放实体机器人以供这类人使用。

人工智能在这个过程中可以通过大量的用户咨询，产生大量的数据集，人工智能通过不断的学习和迭代，最后达到能够解决用户大部分的问题，让人人都懂法、用法。有了法律人工智能，机器可以在不消耗人力时间的情况下同时全面覆盖所有的终端，让百姓拿出手机、电脑就能在任何地方享受到标准化的法律服务，不受时间空间和专业人力分配的限制，从而让公共法律服务得到延伸。

人工智能+公共法律服务的实践

目前，全国已经有9个省（地区）的司法机关相继引用了法律人工智能为当地百姓提供法律咨询服务。

以湖南省司法厅的公共法律服务平台“12348湖南法网·如法网”为例。“如法网”涵盖了律师、法律援助、司法鉴定、司法考试、人民调解等内容，试图为老百姓打造“家庭医生式”的法律顾问服务。老百姓有任何法律问题要咨询，可以先通过“如法网”的“法律咨询”服务，拿出手机就能直接向法律人工智能咨询，立即获得7x24小时实时在线的专业解答。

存在的问题与未来后续研究方向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的限制

机器学习虽然在视觉识别和语音识别上发挥了神奇功效，就目前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来看，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产业应用对自然语言处理的需求。国内目前最优秀的法律人工智能团队也是尽量用法律知识图谱弥补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尚不可突破的短板限制。但在未来发展中，能否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上取得突破决定了该产品是否能在公共法律服务体系中全面充当人民咨询的入口。

法律人工智能对公共法律服务的未来加持

我国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目前正处于探索起步阶段，管理运行的体制机制有待完善。目前来看，如何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服务效率、保证服务质量，扩大服务覆盖率，降低各地区因为经济水平造成的差异都需要持续努力。

共享经济商业模式的法律结构关系

于智亮 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

共享经济是指基于互联网等现代技术，将海量分散化的闲置资源进行整合并共享，主要体现为使用权的暂时性转移，也包括剩余所有权的让渡，以及时间、空间、技能等无形资产的共享，是一种新型经济形态和资源配置方式。在商业环境中，共享经济的概念逐渐延伸至B2C自营（例如分时租赁）、C2B（例如手机回收）、C2B2C（例如二手服装寄售）、B2B2C（例如服务众包）等形式，本质上还是强调“使用而非拥有”的核心，充分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



共享经济的本质是暂时性转移闲置资源的使用权。共享经济模式的前提是产能过剩，存在剩余价值，有多余的闲置资源拿出来分享，共享经济模式转让的是使用权而不是所有权，通俗的说是“租用”而不是“买卖”。2017年共享经济的运营模式分为三种：出租使用权、置换所有权和提供服务。区别于传统的交易行为，共享经济的本质表现为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目的在于各取所需，盘活闲置资源。究其原因，在于全球资源分配不均匀，供需断层严重。加上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即时需求大量涌现，用户希望能够在需要时就能够即时使用，但并不一定要获得该物品，其观念和模式就是“使用而非拥有”。

共享经济的特点

共享经济风口来袭，以租代用冲击传统消费观

金融危机爆发，全球经济显著下滑，造成世界范围内需求严重萎缩，激化了产能过剩的危机，也由此引发失业浪潮的到来。加上环境恶化、新世代新价值观的诞生、以及技术的迅猛发展等时代背景因素，共同推动了共享经济的到来。共享经济强调人人参与，使用权和所有权分离，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利用效率。

中国市场成为共享经济发展沃土，动力强劲，表现

亮眼

随着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中国经济也进入了转型的关键期，2017年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率达到58.8%，同比增长1.3%，比重居首，推动共享经济发展对推进供给侧改革，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意义重大。在政策和资本利好的作用下，中国市场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势头强劲。

细分领域百花绽放，出行场景仍稳坐共享第一交椅

2016年各共享经济市场发展态势良好，各典型领域表现突出，同比增速基本超过100%。医疗共享、知识付费等虽然目前规模较小，但未来发展潜力广阔。继共享单车之后，共享充电宝又掀起了资本市场的投资热潮，受到瞩目。

消费者参与度较高，但对信任安全问题仍有忧心

艾瑞调研显示，2016年平均100人中有77人使用过共享经济APP平台。虽然共享经济强调人人参与，但目前大部分消费者还是作为“买家”角色参与到市场活动中。共享经济的绿色环保、给生活带来的便捷以及收入增益等，是消费者参与的主要因素。但共享同时涉及的人身、财产等安全问题，仍是消费者心中的担忧之处。

新思路呼唤新模式，共享经济扩大想象空间

共享经济进一步渗透各行各业，给传统业态

带来了新的变革。此外，参与方由原先单一领域的深耕，走向了更大范围的生态化布局，由此扩展了多元化的变现途径：由传统的广告收入，增加了金融、电商、佣金、其他增值服务等更多的盈利渠道。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等高科技的应用，扩大了共享经济的想象空间。

中国共享经济行业发展现状

典型共享场景之一：出行

随着共享概念在商业化领域中的延伸，也为了满足人们对于日常出行经济、环保的诉求，目前出行共享领域给出了两种解决方案。一种是平台模式，即由个人车主或传统出租车公司提供车辆对接需求方，平台扮演的是交易撮合的角色，代表企业有滴滴出行、嘀嗒拼车等。另外一种则是分时租赁。即由企业主自行研发或购买车辆，租用给需求方使用。区别于传统的分时租赁，共享经济模式下的租赁搭载了移动互联的信息化优势，通过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进行车辆管理，减少不必要的资源浪费，高效便捷。代表企业有Car2Go，盼达用车等汽车共享，以及摩拜单车、ofo等单车共享。

典型共享场景之二：闲置交易

随着90后新生代崛起成为消费主力军，环保、高性价比的生活态度受到追捧。产品的功能性成为考量的重要因素，由此催生了移动化闲置交易市场的兴起。按照卖家买家属性划分，闲置物品的交易模式一般有两种，一种是卖家买家均为个人消费者，目的在于提高物品的剩余价值利用率；另一种是卖家为B端企业，买家是个人消费者。卖家通过事先回收二手物品，进行标准化处理后售出，赚取差价。二手交易网站由传统的分类信息网站、垂直类网站中二手信息板块向新兴的移动端二手物品担保交易平台演变。

共享经济模式下的法律结构关系

共享经济模式下的法律结构关系可以分为内部法律结构关系和外部法律结构关系。内部法律结构关系中主要包括三方主体，即：共享平台，一组闲置资源提供方，一组闲置资源需求方，不同组合方式结成不同法律关系，并影响对其权利义务设定。外

部结构法律关系主要是政府监管部门监管下的共享平台类企业与同类竞争者及传统行业竞争者之间的法律关系。内外部法律结构关系相互交织形成了共享经济模式下的特殊复杂的法律结构关系和法律后果。

共享经济模式下的法律结构分析

需求者信赖利益的保护

共享经济模式的一个基本特点是暂时性转移闲置资源的使用权，它注重的是服务的一次性体验，不同于网购物品的实际占有。资源需求者通过线上共享平台搜索到闲置资源提供者所登记和提供的信息，在线下消耗时间、精力、财力找闲置资源满足需求，若闲置资源提供者提供的资源存在严重瑕疵与共享平台不符，则需求者该如何维护利益呢？一方面，需求者坚决拒绝使用 and 实际体验，难以维护自己已经支付的信赖利益；另一方面，需求者能否向共享平台追究责任和主张权益？因此，为保护需求者的信赖利益，共享平台有必要对需求者的信赖利益和损失为闲置资源提供者提供担保责任，而这种担保责任可以通过保险机制进行转嫁。

以家政O2O为例，在政府对平台资质进行审查后，在市场的竞争下，平台会自觉地提高运营能力和服务水平。在多个家政O2O APP平台上看到，已经出现平台承诺打扫不干净可重做，并提供家政保险理赔、“磨洋工”退款等标准化服务。通过互联网可以跟踪各个服务环节，并且客户还可以用手机对服务进行评价或上传照片，这倒逼保洁员注重细节服务。随着服务标准化的实施，从业人员数量、质量都将呈现快速增长趋势。

供需双方侵权责任的承担

闲置资源供需双方在人身、财产等方面发生侵权的事件，共享平台虽然帮助供需双方对接，共享平台很难及时承担责任，多数情况是由交易双方自行处理，共享平台对双方有监管责任。闲置资源提供者对共享平台具有很强的依赖性，共享平台往往事先决定了准入主体、交易方式、交易条件甚至交易价格等，并且往往是由共享平台来开具发票，所以倘若没有共享平台的运作，不可能实现线下闲置资源供需双方间具体而实际的交易。共享平台除

了事前的资格审查（主要对闲置资源提供方设置一定的准入门槛，如提供无犯罪记录证明以降低风险等），还可以通过提前为双方购买人身和财产保险的方式来担保风险，如果共享平台未能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

2016年11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对这起“首例涉网约车案件”进行了宣判，乘客颜某与涉案网约车公司对超出交强险部分各承担50%的赔偿责任。

“平台公司与注册司机之间，可考虑将其认定为一种新型用工关系”对于首例涉网约车案件的判决，北京海淀法院通报表示，网约车平台注册司机根据平台公司的指示，提供劳务服务，从而获取一定的报酬，在法律特征上更贴近于事实上的劳务关系。因此驾驶人系在接受平台指派履行合同过程中造成他人损害，平台作为接受劳务的一方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共享单车的侵权责任纠纷似乎更加复杂。相对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划定，骑自行车发生意外的原因以及造成共享单车缺陷和故障的原因，现实情况更加复杂。据相关统计，2017年以来，已公开的因骑共享单车发生的意外事故近二十起，其中既有车辆故障问题，也有用户违反交规的问题，甚至很大一部分当事人不满12周岁。

提供者转租的风险控制

闲置资源的提供者不是闲置资源的所有者而只是其合法占有者，那么其是否也有权通过共享平台来转租他人所有但自己合法占有的闲置资源呢？比如分时汽车、共享房屋。根据《合同法》对定，对房屋的转租行为经过产权所有人同意，只要承租人承担一定损害赔偿責任。由此可见，从保护闲置资源需求者的角度，以及交易的安全和稳定角度考虑，再度转租的行为存在一定的交易风险。不同行业，不同交易形式的风险也不一致。

共享平台违约支付风险的监管

共享平台作为闲置资源供需双方交易中的第三方支付费用预存平台，在闲置资源供需双方完成交易后，对供方具有完全支付的法律义务，但是当共享平台出现经营困难、公司破产或违法导致的财产被查封、扣押、冻结或者出现经营者个人犯罪危机

公司财产安全以及共享平台账户被入侵等情况时，闲置资源的提供方应得报酬以及需求方预存平台公司的资金都难以从共享平台按期获得支付或返还，如共享汽车、闲置交易等共享平台一旦瘫痪势必造成交易混乱，引发矛盾，因此需要提前建立保险机制和制定监管措施。

个人隐私与信息安全的风险监管

共享平台围绕着时间、地点、价格三大要素展开的平台服务经过大数据、云计算等互联网技术分析，使闲置资源提供者的个人经济信息以及需求者的行踪信息都暴露于共享平台的视域下，已经完全触及了个人的隐私。一旦用户的个人信息及隐私遭到泄露，势必损害用户的利益。如何降低共享经济下个人隐私及信息安全方面的风险，切实保护好用户的个人利益，不仅是需要行政部门通过技术手段监管，也需要立法部门通过民事赔偿及担保、行政处罚甚至刑事追责等相关法律进行保护。

创新共享经济模式对法律的挑战

在发展迅猛的共享经济领域，目前的立法明显滞后。骑共享单车发生意外找谁赔偿？共享服务从业者的资质和服务的质量谁来保证？进入共享平台的相关资金池如何保障等等问题。在互联网这个江湖，法律界定变得模糊，规制对象涉及多行业、跨领域，商品交易量级随时间、空间的增长早已超出实业领域的负荷，法律在面对这些全新的理念、全新的产业时是否有全新的视角以应对日新月异的变化，能否实现政府监管、法律研究及治理同步，是最大的挑战。

加强监管的根本是立法，只有跳出现有法律规制的窠臼，以新的立法明确新的模式，才能使监管更加具有针对性和有效性。2017年初出台的《关于促进移动互联网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明确将基于移动互联网的租房、约车等分享经济新业态纳入政府重点培育和引导的方向。因此，急需针对不同共享经济内容的共同点，对现有法律法规进行调整或创新，加强立法的前瞻性，保障消费者权益的同时，也给新型互联网产业创造宽松的环境。

“决策环评”业务的新时代空间

李军强 广东绿建律师事务所



党的十九大，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时代具有新特点，也有新要求。十九大报告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五位一体”，强调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年大计。过去的五年，为落实“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要求，国家大力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出台了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站在新时代背景下，专注于环保法律服务的专业律师，唯有开拓适应新时代要求的专业服务，才能适应形势需要，适应社会需要。“决策环评”正是为适应上述要求而研发的新业务。“决策环评”是指专业律师和其他具备专业能力的人员对政府决策事项进行生态环保合规性评估，并提出专业意见和建议的一种服务。它不仅具有巨大的社会价值和服务空间，也有利于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和合法性；从而助力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目标，也能够防范决策风险。

新时代催生新业务

“决策环评”是落实“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要求的

有效方法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强调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决策环评”就是将生态环保的要求融入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建设事项中的方法，是实现生态环保与它们间的平衡和协调的方法。这完全符合“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要求，是落实这一要求的最有效方法和途径。

“决策环评”是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要求的实际需要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全面依法治国。依法治国要求必须依法行政，依法行政要求依法决策、科学决策。这就要求必须对决策

事项所涉及的各方面都有全面系统的评估，其中也包括对其是否符合生态环保相关要求进行全面系统的评估。否则，就会出现决策失误，影响决策的效率和效果，影响“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实现。

“决策环评”是解决新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需要

党的十九大在分析中国目前形势的基础上，将社会的主要矛盾调整为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

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中就包含了人们对美丽环境和更多生态产品的需要。“决策环评”通过在决策端全面考虑并避免决策对生态环保的影响，从而保护美好生活环境，提供更多生态产品，是有助于解决新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

“决策环评”将助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的实现

十九大报告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强国。

在总任务确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指标中，首次增加了美丽的内容。这里的“美丽”就主要包括了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内容。“决策环评”可以从源头助力美丽目标的实现，进而助力总任务的实现。

“决策环评”是落实“源头控制”原则的最佳方法

在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领域，无论是《环境保护法》等法律，还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策，均始终强调源头控制。政府重大事项决策是所有事项的源头。在决策过程中考虑生态环保的影响，是最好的源头控制措施。

“决策环评”能够有效防范决策风险

随着生态环保监督执法力度的不断加大，因为决策而被追责干部数量越来越多，决策风险越来越大。从前段时间通报的祁连山生态环境损害事件和第一轮中央环保督察的追责情况看，已经有包括3名副省级干部在内的超过18199名干部被问责。“决策

环评”通过为决策者科学决策提供专业帮助，从而防范决策风险。

新业务创造新空间

“决策环评”服务范围大、事项多、内容复杂，且仍快速增长。而目前能够提供该服务的人数少、不成熟，服务能力严重不足。两相对比，存在巨大的业务空间。

“决策环评”需求巨大

1. 有“决策环评”需求的决策者数量庞大。按照中办、国办《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行）》以及各地实施细则的规定，科级以上拥有决策权的领导均需对因其决策事项而导致的生态环境损害终身承担责任。

现实中，普遍存在着在决策中落实生态环保要求的困境。一方面，我国生态环保相关规定数量庞大，决策者难以全面掌握。同时，上述规定修改和调整速度快、变化大，非专业人员很难全面系统了解和把握。另一方面，决策者也缺少学习的时间。大部分的决策者工作量普遍较大，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全面系统学习有关规定。这种困境严重制约着“决策环评”的实施，迫切需要专业机构和人员帮助解决，也就产生了现实的需求。

从我们统计的数据看，目前可能有“决策环评”需求的决策者数量巨大，包括：中央、省级、市级、县级单位及其所属部门和乡镇数以万计的拥有决策权的领导。

2. 需要“决策环评”的事项众多。由于各种原因，我们政府决策事项覆盖范围非常广泛，既有管理事项，也有服务事项，既有生产事项，也有生活事项，既有宏观决策，也有微观决策，既有规划计划，也有重大项目的安排。

总体上说，所有影响或可能影响生态环保的事项，都应该进行“决策环评”。这样看来，需要“决策环评”的事项数量是巨大的。

“决策环评”服务力量有限

“决策环评”是一项综合、系统的评估业务，

这就要求提供“决策环评”服务的人员，必须全面系统掌握和了解生态环保相关规定，并能够提供合理合法的评估报告，提出专业的决策意见和建议。所以，只有长期关注生态环保的人才可能胜任这项工作。

目前能够提供这类服务的专业人员除了环保专业律师外，还包括生态环保部门的工作人员、环境影响评价师、环保法学专家等。能够提供“决策环评”的人群各有优势和不足。

新空间要求新服务

面对巨大的服务空间，我们必须提供全新的服务。这种服务不仅是综合、系统、全面的，也是规范的、高品质的服务，更是符合客户需要的。

综合系统全面是基本要求

“决策环评”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求在评估时考虑到决策项目相关的生态环保的方方面面。所以综合系统全面是其基本要求。

新服务综合性的要求主要体现在规定的全面性上，既包括生态系统的规定，也包括环境保护的规定，还包括资源和能源相关的规定，是综合考量结果。

新服务系统性要求主要体现在评估项目的全过程考虑上，不仅要考虑决策事项本身，也要考虑其上下游、前后端、服务期内外，还要考虑其他可能存在关联的事项，是全过程评估的结果。

新服务的全面性要求主要体现在具体实施时对评估要素的把控上，可以从不同的维度考虑。从评估依据看，不仅要考虑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也要考虑政策、标准的规定。从评估过程看，不仅要考虑规划阶段，也要考虑建设阶段，还要考虑实施阶段及后续阶段。从影响因素看，不仅要考虑决策者的影响，也要考虑相对人的影响，还要考虑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影响。具体到每个项目，要结合其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新服务也必须达到规范的要求

新服务的规范要求主要表现为服务方案、服务

流程、服务标准、服务文本等的规范。服务方案是“决策环评”服务的总体设计，它主要介绍服务目的、需求分析、力量分析、对象分析、内容、方法、流程、质量保证等内容。服务流程是保证服务顺利进行的程序设计，是对具体实施的安排，包括接触了解、方案制定、调查走访、对标评估、报告撰写、完善提高几个阶段，每个阶段均需明确具体的事项和要求。服务标准是服务质量的衡量指标，一般包括价值判断和事实评估，指标要具体明确。服务文本是预先制定的服务中使用文书的示范模板，包括涉及生态环保因素分析一览表、评估报告，资料交接表等。

新服务必须保证高品质

“决策环评”涉及事项多、内容多、部门多，所以我们要采取有效措施保证提供的服务是优质的。

一是早期介入，全程互动。决策评估人员应该在决策事项开始时就参与其中，并在决策制定的全过程，与决策者进行及时沟通和互动，了解制定的目的和要求，对有关规定提出合理合法的修改意见和建议。这不仅有利于科学决策，也能缩短决策时间，提高决策效率。

二是专注专业，精心准备。要将精力聚焦在生态环保领域，通过长期的坚持和关注，熟练掌握相关的内容，全面把握发展趋势，按照不同的标准形成不同的分类体系，制作相应的模块，并根据变化及时进行调整和完善。比如按照决策部门进行分类，按照水、气、噪声等环境介质进行分类，按照自然保护区、水源保护区、环境敏感区等特殊区域进行分类等。

三是组建团队，形成合力。“决策环评”服务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唯有建立合理分工、明确责任的高效团队才能胜任服务工作。

四是整合资源，借力发展。要充分发挥环评机构、环境法学专家的优势，通过建立联盟、长期合作等方式，实现有关机构间的优势互补，增强服务的能力，提升服务水平。

“

品牌指企业的名称、产品或服务的商标，和其它可以有别于竞争对手的标示、广告等构成企业独特市场形象的无形资产^[1]。律师行业，作为现代服务业的一种，拥有利润率较高，人力资源成本高，培养周期长的特点。律所通过对品牌的专有和垄断获得物质文化等综合价值；客户通过对品牌的购买和使用获得功能和情感价值。在过去四十年，众多学者、同仁对律师品牌建设进行不断的探索和研究。但由于律师制度的特殊性和实际情况，仍然未能取得很好的效果。



邵晖

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新时代下，人民群众对律师服务必将提出更高的要求。所以，只有坚持问题导向和需求引领，着力解决律师行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努力提供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律师法律服务，满足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才能在新环境中生存。传统的律师服务和律所发展肯定会越来越难以满足客户的需求，律所品牌建设势在必行，也是唯一出路。

律所品牌的应有之义

具有特色化、专业化

以前，人们普遍认为规模化是律所品牌建设的第一道标杆，但是随着新时代的到来，越来越多的“精品所”成为品牌的代名词，这些所虽然只有几十人，却能占据牢固的市场。新时代律所品牌的应有之义应该是服务具有特色、专业化程度高、某些服务领域在业内及社会上认同度高。可以这么理解，特色化和专业化是律所发展中的量变，而品牌化是质变。

[1]温丽媛：《我国中小型律师事务所的发展研究[D]》，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试论新时代下律师事务所品牌建设

邵晖 王洋 深蓝（合肥）律师事务所

具有排他性，即品牌是独一无二的

律所品牌是指当面对客户、附属专业人员、合作者时，律所将自己与其他竞争者区分开来的一种无形资产。律师事务所的品牌是成为吸引优秀律师的重要砝码，是行业竞争的利器。律所品牌一旦形成，不管被什么人使用，消费者记住的始终是品牌而不是使用人。

具有认同感

律所品牌的认同感，是指客户对律所和律师服务的品牌有用或有价值的判断和评价。如今，越来越多的律师就算支付高额的费用也要加盟已在全国形成品牌的律所，很多客户不惜万里也要委托品牌的律师，这就是品牌的认同感。律所品牌的认同感首先是品牌认知，即当提到品牌就想到的律所的名字、商标、承办的经典案例、优秀的律师和律所的理念等与律所息息相关的一切事务。

律所品牌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缺乏品牌建设的意识和理念

由于我国处于市场经济时间不很长，律师制度更是处于不断变革中，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竞争机制。虽然现在律师行业的门槛越来越高，但是律所和律师的影响力却非常有限。律师大多时间都花在案源开发、处理与法院、客户关系上。大部分律师只在意眼前的利益，缺乏长远的眼光。以业务创收为中心看似短期能够获利，但缺乏持久性，实则是夹缝中求生存；而以品牌为中心则是持久战，短期不会见利，长期则能收到“井喷之效”。

律所品牌与律师个人品牌之间的矛盾

在现实生活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形：在与法院、同行或客户的交谈中，提到某个知名律师时，都知道其是谁，主要业务是什么，但是却不知道他所在律所的情况，这就是律所品牌与律师个人品牌的严重脱节的外在表现。现在很多律师和律所基本是处于“脱离”或“挂靠”的尴尬关系。很多律师愿意花费大量时间和资金去建设个人品牌，但是却不愿意在律所品牌建设上下功夫。归根结底还

是利益原因。经营个人品牌，律师成为最直接的受益人。但律所品牌建设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且收效时间非常长，这就导致很多律所不愿意去打造律所品牌。

众所周知，律师具有流动性强的行业特点。据统计，律师年流动率已经超过10%。律师的流动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导致人才和案源的流失。如果律所没有品牌而过度依赖律师个人，那么，当出现大量律师流动和律所重要律师因某种原因无法继续律师工作等情况时，轻者会导致一个律所业务量急剧下降，重者可能会导致律所轰然倒塌、人去楼空。过度依赖律师个人，会使律所的发展极度不稳定、不具有持续性。只有建设品牌，律所在面对律师流动等情况时，也不会受到重大冲击，律所才会继续长期发展。

律所内部无法形成品牌建设的合力

律所品牌的建设需要组织有力、纪律严明、分工明确、团结一致的队伍，仅凭律所合伙人和骨干律师是无法完成的。目前，我国律所普遍采用的是效益工资制，律师个人的案源和收入直接决定律师的收入。而效益工资制直接导致律师无法融入律所中去，律所只是提供律师一个办公场所而已，律所的发展与律师之间没有关系。同时，律师的工作性质本身具有独立性和自主性特点，导致律所组织纪律管理存在很大的难度。律师之间各行其是，律所的重大决策无法实施，使得律师品牌建设丧失了基础。

如何建设律师事务所品牌

组建具有品牌建设意识的核心团队

新时代下，律师行业竞争会日益激烈，核心团队的价值也恰恰能够在这时体现出来。核心团队既是律所稳定的需要，也是律所持续发展的需要，更是律所品牌建设的最基础保障。律所品牌的建设不仅涉及到业务拓展、市场营销和管理学等方面的问题，而且耗时漫长，组建稳定的核心团队是品牌建设过程中最首要的任务。团队成员每个人都要把自身的经营理念和行为从效益经营为核心转变为品牌

建设为核心，确保律所的每一个重大决策都能得到执行和落实。

正确对待律师个人品牌

律所的发展离不开律师，律师也离不开律所，两者是相互依存、共同进退的关系。律所品牌和律师品牌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律师的个人品牌建设是律所品牌建设的重要环节之一。律所围绕自己的专业定位来传递形象，必须依靠优秀律师的配合才能完成，同时律师只有依托律所才能发挥自身更大的价值。所以，在律所品牌建设中要处理好律师个人品牌与律所品牌的关系，最关键的将利益厘清，在此基础上，律所应该鼓励律师进行个人品牌建设，同时为律师品牌建设提供必要的便利条件和支持。当律师个人品牌建设后，反过来就可以“反哺”律所，成为律所品牌建设的加速器。因此，律所品牌与个人品牌并非替代彼此，而是相互叠加、互相成就的关系。

兼修律所“外表”和“里子”

“外表”就是让社会大众知道、了解和熟悉律所的方法。如设计一个使人印象深刻的律所logo，将律所打造成大气、有品位的办公环境。当然还包括律所的对外推广和营销，现阶段，微博、微信、网站等都成为良好的推广方式。实践证明，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有效运用各种自媒体手段的宣传、营销，可以快捷、有效提升品牌的社会影响力。“外表”可以使律所快速地展示在公众面前，被人们知晓。

光注重律所的“外表”，而忽视了律所“里子”，律所是永远不会产生品牌效应的。“里子”就是律所的文化内涵，是品牌建设中的核心和关键。文化与品牌是手心与手背的关系，对内是文化，对外是品牌^[2]。律所文化建设是自我“内功”的修炼。律所先进的管理模式、科学的内部管理与合理分配制度、强有力的团队精神、优质的服务质量保障体系都是律所文化建设的内容。良好的律所文

化是律所发展的源泉和动力，是提升律所及律师社会地位的有力保证。

设立律所品牌建设分级管理体系

目前，建设品牌的律所与其他律所一样，业务范围基本上不存在区别，且品牌的建设完成也没有任何界定的标准和指标，这样会直接导致律所品牌建设的积极性。笔者建议，律所品牌管理可以参照建筑业企业资质等级管理相关规定，将律所品牌分为一级到四级四个等级，由行业主管部门与行业协会共同评定和管理。对不同级别的品牌律所可以接受委托的案件按不同类别进行相对确定，这样就可以积极引导、激励律所向规范化和科学化发展，进而能够更好完成品牌的建设。

律所品牌的维护

律所品牌建设来之不易，而品牌的维护是其能够长期、稳定存在的保障。律所品牌的维护主要包括法律维护和经营维护。

律所品牌的法律维护

律所品牌的法律维护包括商标权的及时获得、对律所品牌侵权行为的严厉打击和品牌秘密的保护。首先是加强律所品牌商标的注册工作，使品牌获得法律保护，这是保护品牌最为有效的手段之一。任何创品牌的律所都必须及时注册自己的商标，切勿等律所品牌形成后再注册，以免被他人抢注。其次，对于不正当竞争行为、对品牌的恶意诋毁行为以及假冒品牌行为等侵权行为要进行严厉打击，保持律所品牌的权威性和不可侵犯性。

律所品牌的经营维护

律师品牌成熟后，在后期经营过程中只有不断提升自身的品牌价值，通过不断更新自身的法律服务、提高法律服务水平和质量来维持客户对品牌的忠诚度。品牌的经营维护就是律所在开展具体的法律活动中所采取的一系列维护品牌形象、保护律所品牌市场地位的行动。

[2]陈召强：《关于创新律所文化建设的研究》，载《中国律师》，2013年11期。

以“和”为主线的律所文化建设思考

程守太 张玉亮 泰和泰律师事务所



程守太

关于“文化”，《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可见，文化是个很大的概念，人类创造的一切美好的东西，以及为了达到美好所做的一切努力和一切向美好发展的思路，都是文化，律师事务所的文化建设也离不开这个大的范畴。

泰和泰经过十七年的发展，文化建设一直是其努力思考并不断完善的重要抓手。泰和泰从一个地方小所，逐步成长为走向全国，并成功布局海外的全国性大所，在战略建设、品牌建设、平台建设、制度建设、党的建设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和实践，我们认为，“和”恰巧表达了泰和泰人不断追求的价值，也是我们文化的主线。

关于“和”，欧阳中石先生在《文化漫谈》中认为“‘和’是把两种不同的事物融合到了一起，各自有着自己的特点而和平相处。‘和’就是中国文化的精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也是中华民族不懈追求的理想境界。”这正是泰和泰“泰而不骄、和而不同”的最好注解。

战略建设，高远而务实——天地之“和”

战略布局——立足西部、放眼全国、对接世界

泰和泰起步于中国西部城市成都，作为西部律所，要走出地方律所的突围，面临的困难非常多。面对种种困难和疑虑，我们始终在思考和探索。2003年，我们在北京设立了办公室，2007年，在深圳设立了办公室，战略上首先积极融入最为厚重的首

都和最为开放的深圳。

2013年4月在峨眉山举行的合伙人会议是个重要的转折点。这一次，我们明确了发展战略：“立足西部、布局全国、对接世界”。西部的重庆、拉萨办公室先后开业。2015年是较大规模布点的一年，这一年，泰和泰开了四个办公室：济南、上海、昆明和华盛顿。其中济南办公室是比较出人意料的，当时并不在战略布点范围之内，但发展之快、之好，超出意料。济南办公室开业的时候只有不到10人，现在已经近30位合伙人，总人数接近120人，2017年创收已经位居济南第六名。2016年，香港、贵阳、首尔、釜山办公室相继开业。贵阳办公室采取了公司制的管理模式，发展也是非常迅速，状态非常好。2017年，天津办公室成立，西安、太原办公室正在推进中。

战略目标——打造国内领先的大型综合性律师事务所

2016年，我们正式组建全国性的战略委员会，由管委会成员、分所主任组成，办公室设在北京，确定了更为明确的战略目标——5年内将事务所打造成中国领先的大型综合性律师事务所。

泰和泰成立之时恰逢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立足西部的差异化选择避免了与京沪大所正面竞争，中心城市的选择布局又恰如其分，得天时、地利人和，成为最懂得地方如何办所的律师事务所。我们认为，律所扩张不能简单地做1+1=2，不能仅为布局而扩张，更需要的是人才融合，需要的是大家在一个大的平台上合作、共享、协调发展，产生内在动力。

品牌建设，差异化发展——专业之“和”

“差异化”，是认可不同，让不同充分发展，是“和”的具体体现，是泰和泰的血脉。地方律所缺乏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的全国性区位优势、资源优势、人才优势、辐射优势，如何走出大所圈地合并、传统所恶性竞争的重围，通过泰和泰的实践和努力，我们认为“差异化”是一条必由之路。

创新专业化服务

律所的发展不仅在于事务所的大小，更在于律所发展的专业性特点。大所不一定强，但不大一定不强，综合性强所一定要达到比较大的规模。律师要专，律师专才能在自己主攻的专业领域里做到“高精尖”、“人无我有，人有我优”，在规模大、律师专的律所才会有更多的内部合作，客户也能慕名而来。

泰和泰极为重视特色化、细分化的专业发展，如专门设立的劳动人事中心、知识产权中心、医疗健康中心，都充分体现了泰和泰专业化、细分化的专业发展方向。同时，泰和泰在金融、证券、资本市场领域已经形成鲜明的法律服务特色，在投融资、PE/VC、改制、上市、债券发行、并购等领域具有丰富经验。

真正实现各地办公室之间合作、共享

泰和泰特别注重各办公室之间的协调发展、注重律师的团队化建设，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一位律师、每一个办公室的最大能力和最大特色。各办公室之间能够根据专业组建全国的专业研究开发团队，能够根据具体业务组成办理该案的全国性专业化业务团队。比如2015年新成立的济南办公室，与北京、成都、重庆、贵阳、上海、拉萨、昆明等各办公室之间都有非常多的业务合作，既有专业引进，也有专业输出。通过业务的联动，提高了泰和泰法律服务的水平，打造了更多更专业的律师团队，实现了各地办公室的均衡发展。这种团队化、专业化的法律服务模式保证了律所持续精进的发展特色。

充分利用地域优势

地方律所应发挥对当地法律市场了解的优势，在一些特定的服务领域（特别是本地的诉讼业务、政府法律服务、人力资源法律服务等）显示出与外地大所的比较优势。无论是沿海发达地区的国内企业，还是外商投资企业，都希望能得到本地化的法律服务，因为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特殊商业环境和

政治环境，只有能深刻了解本地文化和商业习惯的律师才能更好地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所以，地方律所应该充分利用自己的本地化优势，提供差异化的服务。

引进来，走出去，实现跨越式的发展

引进来，不断强化品牌影响力，吸引专业人才，夯实专业基础。泰和泰目前已经有近百位涉外律师，工作语言涉及英、美、日、德、法、韩等语言，多名律师同时拥有美、德、意、澳等律师执照，涉外服务能力明显提升，差异化的竞争力日益突显。

走出去，顺应国家发展潮流，为律所寻找新的契机。举例来说，随着“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落地，泰和泰越来越多地为这些沿途国家的项目提供法律服务，比如坦桑尼亚的金矿项目，非洲的矿产投资项目、印度电子商务项目、巴基斯坦发电项目、澳洲、法国酒庄项目等。我们要善于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以敏锐眼光在国家倡导的宏观政策、发展战略中发掘新的业务增长点，走出去的发展之路也就会更顺畅。

技术驱动管理模式和商业模式创新

目前，各地都涌现出一批运用先进技术促进

律所快速发展的事例。技术驱动法律，促进专业、管理和商业模式的创新，离我们越来越近。拥抱创新、持续创新，明天优于今天，后天优于明天，是保持基业长青的唯一道路。泰和泰精心打造的IMS系统已经成功上线，实现了各地办公室案件统一管理、全球资源平台的整合、品牌的统一展示和知识共享；另外注重团队协作的“泰云”智能化系统也将在2018年初发布，泰和泰在智能化方面持续进行着探索和实践。

平台建设，为未来谋篇——人才之“和”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一家律师事务所由一个个不同的人所组成，律所的文化也由一个个不同的人来传承。文化是根脉，决定一家律所能走多远，而人才将根脉所蕴藏的养分输送到各个枝干，才造就一个枝繁叶茂的未来。

泰和泰善于发掘专业领军人才，善于对人才能力的挖掘、整理和运营，特别注重突出专业上的一专二辅。

为了将人才的培养系统化，泰和泰设立了“泰和泰律师学院”。一是组织校园巡讲，帮助青年学生成长也为人才吸纳做好储备。二是开展每周论



坛、基础培训周、提高培训周、提高培训季、周五沙龙等培训活动，更为体系地培养青年律师，建立律师成长机制。三是进行全国巡讲，组织合伙人和优秀律师在全国各办公室进行业务方面的培训与交流。四是今年开展的“青年律师训练营”和“未来律师选拔大赛”，为律所储备和发现人才。

制度建设，包容而共赢——梦想之“和”

妥协、奉献、包容的合伙文化

良好而有效的管理体制是一家律所能够长期健康发展的保障。泰和泰实行合伙人会议决策制度，下设管理委员会和五个专门委员会，合伙人会议是最高决策机构。合伙人会议议事，均按票决，主任在合伙人会议、管委会会议中也只有一票，实现了真正的民主体决。

律所的合伙制很容易带来矛盾和争吵，因此很多律所变成了一言堂，而泰和泰的管理精髓从品牌创立之初就已经确立——君子和而不同。在合伙文化上，讲究“妥协、奉献、包容”，泰和泰的事是泰和泰所有人的事，泰和泰这个品牌重于泰和泰的每一个人。

合作、分享、共赢的分配制度

分配要简单但又又要产生激励作用。泰和泰专业化的根基就是合作、分享、共赢。泰和泰采取1个主协调律师1个组长1个主办律师1个协办律师1个团队支持的“五个一模式”，通过业务合作，打破了传统律所与律师的隔阂，通过业务交叉将整个所结成为了一张网，降低了人才流失率。对应这种合作文化，泰和泰采用的是公司制加分成制的双轨并行分配模式，既有利于团队律师的成长、人才的积累，又有利于律所专业化的形成。专业化的团队通过专业吸引来合作，又通过合作进一步促进专业化，实现良性循环。

公共管理基金，为律所发展蓄力

泰和泰目前已设立三项公共管理基金，一是风险基金，二是发展基金，三是知识管理基金，用

于律所风险管理、品牌的布局、律师学院的费用支出、知识管理系统的建立。同时，正在启动设立长期发展保障基金和合伙人退休保障基金的研讨，为事务所“人和”精神的传承及筑梦百年律所的目标夯实基础。

组织建设，党建促所建——党建之“和”

2017年6月9日，泰和泰迎来事业发展的历史性时刻：中共泰和泰党委正式获批设立，成为四川省首家设立党委的律所事务所。

泰和泰一贯重视党建工作，建所第二年即设立了党支部，现拥有300余名中共党员，党委直属八个支部，另有八个分所设立了党支部。律所设有《泰和泰党刊》、《社会责任报告》，每年都组织全员参与项目多样的党建活动。

泰和泰把党建作为律所建设之核，重点抓“五个统一”：即律所文化与党的文化统一、律所纪律委员会与党的纪委统一、所办与党办统一、律师执业关系与党的组织关系统一、职业发展与理想信念统一。党建工作不搞花架子，真正做到了实处，这是泰和泰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

党的十八大以来，文化强国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文化自信越来越得以彰显。文化融合是任何行业、任何企业做得好、走得远最不可或缺的基因。中国的国际化进程要求中国律师既要懂得东方文化，更要熟悉国际惯例，在中国律师的国际化上做到“和而不同”。

泰和泰作为在地方如何办所做过积极探索的律师事务所，从地方走向全国，从全国走向世界，快速发展，不仅仅是“现象”，更是良性发展的“常态”，这也是泰和泰文化得以积淀和发展的必然，是“人和”理念内化于心的必然。

本文对泰和泰在中国律师行业发展中提供的一些文化积累探索和总结，希望能对致力于律所文化建设的同仁提供一些借鉴和帮助。

律师履职党政机关法律顾问的若干思考

张弢 广东金地律师事务所



党政机关法律顾问是我国法治建设的新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全面依法治国任务依然繁重”，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关于推行法律顾问制度和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制度的意见》明确要求，2017年底前，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县级以上各级地方党政机关普遍设立法律顾问，外聘的法学专家和律师可以担任法律顾问。这是继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普遍建立法律顾问制度”工作任务和目标后，国家层面再次确认党政机关法律顾问的价值和方向。

在新的形势下，随着我国民主法治进程的快速发展，公民的权利意识和法治意识空前提升，对法治中国、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的要求越来越高。如何优化并创新律师履职党政机关法律顾问服务的内容和模式，既是律师面临的时代挑战，更是律师展业的时代机遇。

找准定位

党政机关法律顾问不同于企业法律顾问，党政机关的顾问服务涉及民生的方方面面，土地征收、拆迁补偿等业务领域更是涉及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如处理不当，可能会激化社会矛盾，影响大局稳定。做好、做专、做精律师履职党政机关法律顾

问服务，首当其冲的是找准党政机关法律顾问的定位，防止法律顾问服务出现偏差。

《国富论》中将政府形象喻为“守夜人”角色，政府的合理定位应当是服务政府和有限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了律师的三大职责，“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实践中不禁会有这样的拷问：党政机关法律顾问的职责定位为何？党政机关利益的维护者，党政机关决策的附和者，党政机关法律服务咨询的提供者，党政机关依法行政的参与者，抑或法治的守护者？

无论从法律角度还是从政府角度，党政机关聘请顾问律师的真正意义均在于为决策获取专业、客

观的法律意见，而非寻求一个法律附庸。所以，律师履职党政机关法律顾问需要增加自身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保持一定的超脱和独立地位，在法律许可的范畴内，维护党政机关的合法权益，并最终维护和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优化服务

参与处理行政复议、诉讼、仲裁等法律事务，参与合作项目的洽谈，协助起草、修改重要的法律文书或者以党政机关为一方当事人的重大合同是党政机关对顾问律师最基础的法律服务需求。党政机关法律顾问十分强调认可和信任，而此种认可和信任获取的前提是夯实基础法律服务。只有基础法律服务到位了，方能深入到党政机关法律服务内容的深层次领域，洞察党政机关法律服务的发展趋势，更好地发挥党政机关法律顾问的使命和职责。笔者认为，在夯实基础法律服务、取得党政机关认可和信任的基础上，顾问律师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优化和创新党政机关法律顾问服务的内容和模式：

用项目管理思维拓宽法律服务的广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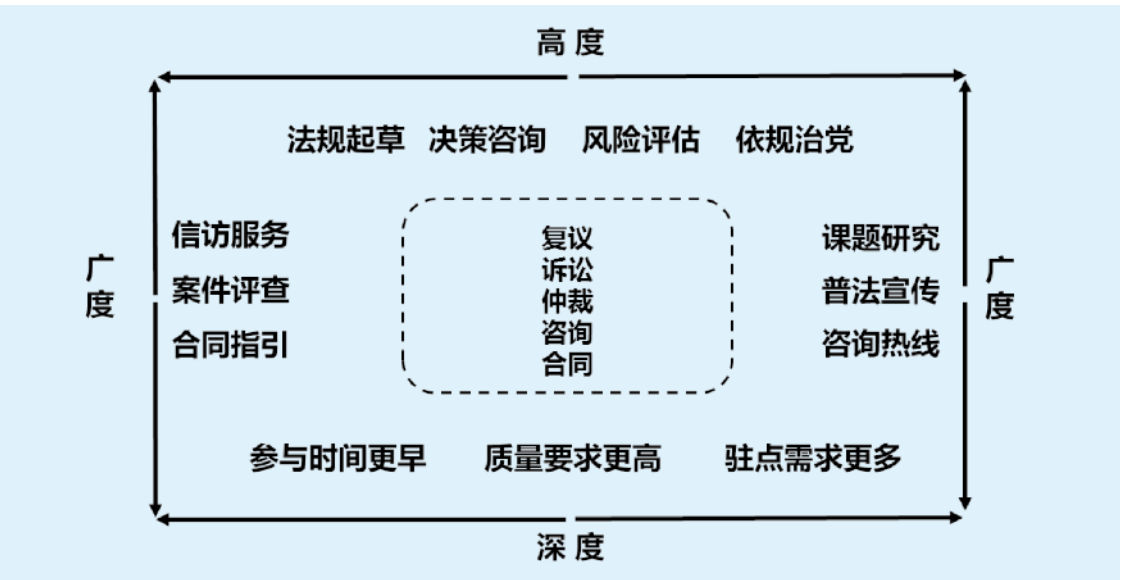
所谓项目管理思维，就是要在特定的时间、预算、资源限定内，依据规范完成预定的、明确的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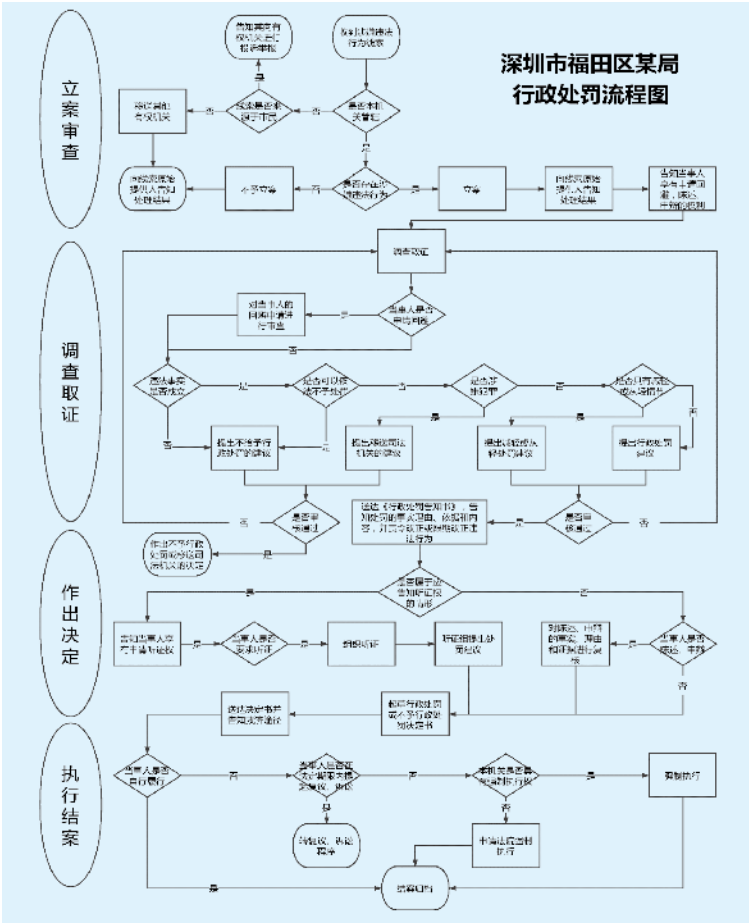
标或目的。项目管理具有如下优点，能够拓宽党政机关法律顾问服务的广度。

首先，项目化管理可以把一系列单独的、零散的并相互关联的活动统筹为一个项目。比如，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某管理局在2016年之前，为了做好普法宣传工作，要分别与户外广告公司、广播电视机构、高校、视频制作机构等洽谈、对接。在时间安排、预算控制、资源统筹等方面经常失控，总体效果也不好。在法律顾问提出以项目化方案开展普法宣传工作后，该局只需要通过招投标的方式选定一家律师事务所全面完成该局全年普法宣传工作即可。该律师事务所会全面负责选择与监督各家专业机构做好各自工作，而且会在专业效果上充分把关。

其次，项目化的管理可以把一些反复出现的工作通过项目做精、做专。在服务型政府的时代定位下，高效行政是党政机关的依法行政的重要价值追求。行政执法程序流程化、执法文书标准化是做好依法行政工作的重要抓手，而这正是优化、创新律师履职党政机关法律顾问的重要内容。

再次，项目化管理可以把一些工作中最新遇到的难题和疑问通过课题研究的方式进行深入分析和解读。如《〈深圳经济特区规划土地监察条例〉若





干条文理解与适用》项目，就是通过对规划土地监察条例第三十八条的研究，全面、深入地解读了通知有关单位停止供水、供电、供混凝土的性质是行政强制措施还是行政协助行为等争议较大的问题。该项课题研究为行政机关日后的相关执法提供了巨大帮助。

从参与顶层设计提升法律服务的高度

大智立法。立法是执法、司法、守法的基础。如果立法出现缺失或者立法不完备，就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不利于法律的运行和法律权威的维护，最终损害广大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因此，应当充分发挥党政机关顾问律师在顶层设计中的独特作用。

1. 积极参与立法工作。

首先，党政机关顾问律师应当积极参与规范性文件的起草、完善、论证和审核，以完善立法的方式从个案维权走向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如此，方能体现律师在法治社会中的社会责任与价值。如笔者

曾参与的《福田区临时用地和临时建筑管理暂行办法》《福田区旧住宅区改造暂行办法》起草与论证，就从制定规范性文件的目的、结构、内容和禁止性事项等多方面向行政机关提出了法律意见，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其次，党政机关顾问律师应当洞察我国目前立法领域的空白，并可就相关空白向立法机关建言献策。例如，我国破产法律制度因为缺少个人破产制度，因此被称为是“半部”破产法。深圳市律师协会向深圳市人大提出的《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立法建议函，以及深圳卢林律师起草的《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律师建议稿），即为极具洞察力和远见的尝试。

2. 积极推动立法评估。

我国大多数地区和机关未开展过立法评估，仅以实验的形式实践于特定地区特定领域。在广东省，广东省人大关于《广东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的立法后评估和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关于《深圳经济特区规划土地监察条例》的立法后评估均已经开始委托律师事务所开展。笔者认为，立法评估作为评价立法水平的机制，具有较为重要的社会意义和一定的市场前景，可以成为创新律师履职党政机关法律顾问的新业务。

3. 推行重大决策法制审核。

党政机关的行为，尤其是抽象行政行为，由于具有反复适用性，因而对行政相对人造成的影响更为广泛、更为深远。党政机关在作出重大决策之前，应当进行法制审核。如国家五部门出台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细则》，就对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政策措施进行了规范。今后，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政策措施在未经审查前不得出台，通过审查的才可以出台。这是未来行政机关重大决策审查的新动向，不仅能够使得党政机关的决

策更加合法合理，还能使得行政相对人的权益得到更为充分、有效的保护。

以用户体验为中心挖掘法律服务的深度

体验经济以发达的服务经济为基础，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用户体验是体验经济时代衡量律师服务水平甚至专业水准的一个重要尺度。如何进一步提升用户体验是创新律师履职党政机关法律顾问的重要课题。提升用户体验的方式多种多样，其中之一就是从空间、时间和感知等维度提升用户对服务的感知度。

1. 空间维度。

提升体验度的方式之一在于加大空间参与力度。以信访服务为例。信访服务历来都是党政机关的大难题，如何更好、更快、更和谐地解决信访难题是党政机关所要面临的一大课题。实际上，律师对信访服务的参与度还远远不够，尚有诸多提升空间。例如，各部门信访室可以有律师进行驻点服务，及时解答法律方面的疑难点，使得信访工作能够在律师专业知识的帮助下更具法治色彩。在有专业律师在场的情况下，信访服务人员的应对更加从容自信，体验度自然能够得到提升。

2. 时间维度。

提升体验度的方式之二在于前移参与时间。通常情况下，一个法律问题的解决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分阶段的、循序渐进的。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独特的重点、难点和痛点，若法律顾问能够更早地参与进项目，就可以根据各个阶段不同的特点针对性地提供法律服务。此外，由于较早就参与项目，就会对项目的了解更为全面，更便于法律顾问顾及全局，尽量避免前后矛盾的情况发生。简言之，参与时间越早，服务质量越高，用户体验越好。

3. 感知维度。

提升体验度的方式之三在于灵活感知方式。若法律顾问能够在用户存在疑惑的情况下，通过流程图、表格或数据报告等可视化方式向用户呈现法律服务成果，将专业性的问题揉合进可视化方式之中，解答用户的疑惑，那么用户的体验感就会大幅

度提升。这属于工具性的层面，比较容易操作且更易得到实现，是创新律师履职党政机关法律顾问的技术破局点。

放眼未来

法律顾问服务的内容从来都不是模式化的、一成不变的，而是根据用户的需求随时变动的、充满活力的。在不断更新服务内容的时候，律师应当“立足基础，打破边界；立足当下，放眼未来”。放眼未来，需要律师要有敏锐的观察力和洞察力，洞悉用户后续可能需要的服务内容和类型，未雨绸缪。

十九大报告“依法执政”的提法，更进一步明确了法治的作用，即党和党员都应当在法律的框架内行事。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法规局全面系统的梳理，1949年10月—2016年12月中央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共260件，形成了“1+4”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基本框架，即党章，以及党的组织法规制度、党的领导法规制度、党的自身建设法规制度、党的监督保障法规制度四大板块。

法律和党内法规虽分属于两个不同的体系，但是却对党政机关都有约束力。那么法律和党内法规的关系若何？如何理解和运用党内法规制度进一步规范 and 约束党政机关的行为，都将是创新律师履职党政机关法律顾问领域的处女地。若能率先对党内法规进行解读，并为党政机关制作行之有效的机制或流程，都无疑将拓宽律师履职党政机关法律顾问的广度，大大提升党政机关的体验度。党内法规制度的理解与运用将成为党政机关法律顾问服务的下一个风口。

在强调全面建设法治中国的今天，律师履职党政机关法律顾问不是“一劳永逸”的。顾问律师应当找准角色定位，适时调整和更新法律服务内容，不断提升自身的专业素质和法律服务水准，在保证与党政机关法律顾问身份相匹配的同时，为党政机关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提供更为客观、全面、专业的法律意见。

律师调解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的价值与定位

李劲松 陕西至正律师事务所

2017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人民法院特邀调解的规定》，探索性地对人民法院委派或者委托律师等社会力量参与调解涉诉纠纷作出了规定。在大力倡导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ADR）的当今社会，律师作为法律共同体的一员，其在纠纷化解、矛盾解决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1]作为ADR不可或缺的一环，律师调解正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发挥着重大作用。



律师调解的独特优势

律师职业因其具有的独有特征以及在我国司法现状中具有的时代特征，在调解时代下展示出独特优势。

律师职业的专业性

目前实践中广泛存在的人民调解、行业调解更多关注的是利益的调和而非法律的契合性。而律师取得律师资格的前提是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取得法律执业资格证，意味着其专业性有着权威的保障，在调解中能够充分发挥律师的专业性。

此外，律师常年直面纠纷，专业知识过硬，很容易初判各类纠纷中的是非，并分析双方权利义务关

系，在预估的基础上运用灵活的调解技巧引导当事人达成和解，使得纠纷被消灭于法院之外、诉讼之外。

律师职业易受信任性

法院、仲裁调解均存在一个问题，即无论是法官或是仲裁员均代表公权力或社会力量，而这种力量使得当事人对法官、仲裁员之间始终保持着隔阂。这种隔阂一方面有利于给当事人之间形成压力，迫使双方各退一步达成协议。但也存在弊端，就是当事人容易基于该压力产生抵触心理，或是怀疑法官的中立性。

律师作为法律共同体中的一员，其执行行为有《律师法》的约束及律师协会和司法局监管，也使得当

事人容易对律师产生信任感。没有权力色彩的律师，在赢得当事人的信任之后，其调解的效果可想而知。

律师职业社会责任感

虽然我国律师作为市场经济下的一种职业，法律人选择从事律师行业也大多是为了通过向社会提供法律服务而获得报酬、安身立命。但我国律师行业自诞生以来，从未忘记向社会承担应尽的责任。中国律师身处社会主义的时代背景，长期在法律援助等多个领域为社会发光发热。

自立案登记制实施以来，大量的纠纷涌入人民法院，法官面临的诉讼案件实在庞大，往往缺乏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对当事人之间的纠纷进行反复调解，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对于调解不成的案件应当及时判决不能久调不决，所以法官也面临着法定审限的限制。律师以承担社会责任的形式，将调解作为自己反馈社会的途径，其对纠纷处理所投入的精力就会更加巨大。

实施模式灵活性

律师调解在我国的司法实践已经生根开花，并在各地形成不同的实践模式，具体来说大致分为三种模式。

其一为行政主导型，即在行政机关的主导下对律师调解员进行选任、对调解规则进行制定、对调解结果进行认可。其二为律师主导型，即由律师协会或律师事务所成立律师调解中心，独立进行律师调解程序。其三为法院主导型，即在人民法院主持下选任律师调解员并在法院设立专门的律师调解室，就近解决涌入法院的纠纷。

上诉三种模式的律师调解，均各有利弊，但无论何种模式，均能发挥律师在大调解时代下的价值功能。同时也体现了律师在参与调解过程中独具的方式多样、模式灵活的特征。

实践问题及分析

尽管律师调解以其独具的优势在我国司法实践

中有着发展的趋势，也取得了不少良好的效果，但在实践中还存在着诸多问题。

沦为案源收集渠道，公益性导致参与度低

正如前文所述，律师职业具有营利性，这一特征注定律师从事法律纠纷处理当中极易出现将纠纷由调解向诉讼中引导的现象。在司法实践也存在不少政府设立的律师调解室或是法院设立的律师调解室，当事人的纠纷进入调解室后，在了解基本案情后对于“有利可图”案件，个别律师会寻求代理机会。

律师知识结构缺乏，合格性律师调解员缺乏

律师在经历国家司法考试，并在长期的法律实务中，对法律的学习会越来越深，可谓是法律上的专家。但是调解并不仅依赖于法律知识，调解是法律、道德、风俗、习惯的有机融合。正如有学者指出，“从微观上讲，调解实是一门兼容情、理、法的‘化干戈为玉帛’的艺术；从宏观上讲，调解堪称‘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和谐统一的治理之道。”^[2]

也就是说，一个合格律师调解员不仅是法律的专家，更要是利益的调和者、社会风俗的谙熟者。我国具有一大批符合上述条件的律师，但符合上述条件的律师其时间及精力难以允许其广泛从事律师调解。正如我国当下法律援助制度中，大多数法律援助案件均由执业年限较低的律师进行办理，导致我国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难以实现有效辩护，而在律师调解中此问题也是存在。

社会观念转变度低，信访信诉不信调

随着我国经济的蓬勃发展，纠纷的日益增多，人民法院处理案件的压力越来越大。自立案登记制实施以来，纠纷当事人对于解决纠纷的渠道开始向诉讼倾斜，大量纠纷向法院涌入。正是基于化解纠纷、分担法院压力的考虑，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被提上议事日程，律师调解逐渐受到重视。但因社会观念还没有及时转变，多元化纠纷解决的思想也尚未传递到普通民众的脑海，这导致普通民众信访、信诉而不信调。

[1]卢君：《法院委托型律师调解员制度构建思路与方案设计》，《法官说法》，2016年第9期，第76页。

[2]刘武俊：《重估调解制度的价值》，《中国司法》，2004年第一期。

法律制度不完善，调解效力不得保障

尽管我国《律师法》《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等法律、司法解释等法律文件中，对于律师调解均进行了列举性规定，但至今未能有一个规范性法律文件对律师调解的具体制度进行细化规定，导致实践中均是摸着石头过河，或是畏手畏脚。

再就律师调解的结果而言，调解失败自不待言，若调解成功则双方签订调解协议，此调解协议的效力仅相当于民事合同。当一方不履行调解协议时，另一方又需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不但未能化解纠纷同时也导致当事人失去对律师调解的信心。

困境解决

律师协会积极引导

将律师调解纳入律协的日常工作范围，是规范律师调解行为的有力措施。就目前大多数律协均采用下设专业委员会的形式，对律师协会的日常工作进行分管，倘将律师调解作为一个独立的专业委员会进行设立并运行，用于开展律师协会对本辖区内律师调解工作的引导、监督、管理，必将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积极作用。同时律协可通过举办多种形式的培训会、讲座等学习活动，帮助律师提升调解能力，早日成为合格的律师调解员。

律师自我能力的提升

身处于大力建设法治国家、法治社会的今天，身处于法治体系伟大变革的大时代，律师不应仅寻求经济利益的获取或是社会声誉的追求。作为社会主义法律职业的一类及法律共同体的一员，律师应当积极主动地担负社会责任，在能力范围内为法治建设做贡献；同时通过各种学习渠道，提升各专业方向的能力，成为一个领域的专家，通过诉讼掌握知识并运用于调解，通过调解拓宽能力再反哺于诉讼，这也并非是一味的付出。

多渠道ADR理念宣传

对于大众信访、信诉不信调的问题，需要通过

加大法治宣传来解决。宣传的主体则具有多样性，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社区组织、行业协会、律师事务所，均可作为宣传的主体。其中笔者重点强调，司法机关在受理案件前后，即可向纠纷当事人传达调解思想，并且通过法院名义对外宣传调解，使得民众更易信任调解方式；律师事务所的宣传，作为律师调解的主体自身对外的宣传教育是必不可少的，尤其律师或律所可将经律师调解解决争议的案例制作成册，备至于纠纷易触点。转变民众固有观念，在笔者看来是最为关键之处。

法院、公证机关联动机制

调解的往往表现为调解协议，可就当下法律规定而言，这一调解协议仅具有合同效力，不具强制执行效力。要为这一合同寻求强制执行效力，笔者认为当下可采的方式有二，其一为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其二为调解协议的公证。这两者可在当前法律框架下赋予调解协议以强制执行效力，然而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的规定是建立在民调解组织的基础上，律师调解是否符合该条件。解决律师调解后调解协议的效力问题，关键在于建立人民法院、公证机关与律师调解组织的联动机制，法院、公证处可对律师调解组织进行审查后予以入库，对于该调解组织下的调解协议予以认可，从而赋予其强制执行效力。

结语

建立、健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解决我国社会纠纷、维护社会稳定、建立和谐社会的有效途径。而律师调解作为调解中不可缺少的一环，是ADR的有效渠道之一。尽管在实践中，我国的律师调解还存在诸多问题，但通过各地不同模式的构建来看，律师调解依旧是呈上升趋势的。完善法律关于律师调解的详细规定，加大律师协会对于律师调解的监督、引导和管理，大力进行法治宣传教育，保障调解协议效力的司法确认，通过种种措施，笔者相信律师调解作为ADR下的新兴纠纷解决渠道，必将为中国乃至世界解决日益增加的纠纷提出中国方案。

青年律师如何有效参与刑事辩护全覆盖

王露 湖北松之盛（襄阳）律师事务所



2015年6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意见》，指明建立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制度，法律援助机构在法院、看守所派驻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建立法律援助参与刑事和解、死刑复核案件办理工作机制，依法为更多的刑事诉讼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2017年8月，两高三部印发《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工作的意见》。2017年10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开展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办法》，提出在刑事案件审判阶段试点律师辩护全覆盖。

从历史角度看，随着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的推进，在刑事司法改革领域，无论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还是刑事辩护制度、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均逐步深化和发展。

律师参与刑事辩护的重要性

从刑事速裁、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试点看，必须有刑辩律师参与；从刑事辩护全覆盖看，扩大法律援助范围，提高刑辩律师参与率。

早在2014年6月，人大授权“两高”在部分地区开展为期两年的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随后两高两部发布《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工作的办法》，2016年试点结束。周强院长指出，“速裁程序试点，是完善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的先行探索”。2016年9月，人大授权“两高”在全国18个城市正式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同年11月，两高三部印发《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办法》。

刑事速裁在适用的案件范围、协商的内容、协商阶段等方面作出了明确规定，从刑辩律师的角度看，在我国辩护率在30%左右的大背景下，判处“一

年以下”的案件当事人聘请辩护律师的可能性很小，律师参与度也非常有限；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中，从一年以下扩大至三年以下且不限罪名，从依照申请获得辩护到“应当通知”值班律师提供法律帮助，提高了律师“介入率”；此次在8个省市开展刑事辩护全覆盖试点，扩大了法律援助范围，确保了刑辩律师能够更广泛参与，也是保障人权的充分体现。

在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和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过程中，律师充分参与辩护的重要性决定了顶层设计的重视程度。

青年值班刑辩律师是刑事辩护全覆盖的主力军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辩护律师参与具有重大意义

早在2006年9月，值班律师制度在河南省焦作市修武县试点，后扩大到全省；2014年，党中央做出了全面推进司法改革的决定，司法制度的各项改革措施呼之欲出，其中包括将值班律师制度面向全国推广；2015年《关于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意见》再次提及值班律师，随后，全国各地司法行政机关在看守所设立法律援助工作站，值班律师在改革中的重要作用也逐渐彰显；2016年、2017年，随着刑事速裁试点的结束

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的开始，通过“值班”形式让刑事辩护律师参与，对确保认罪认罚的自愿性、真实性，对简案快办、防止冤假错案，对保障诉讼顺利进行等，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必然要求值班律师制度协调发展。

青年律师完全能够胜任值班律师工作

1. 关于值班律师的来源。

从辩护权来源角度讲，律师分为委托律师和法律援助律师。社会律师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家属委托，成为《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辩护人，行使辩护权，即所谓“委托律师”；法律援助机构中的公职律师和社会律师组成了法律援助律师，接受指派或指定后，成为提供法律援助服务的“法援律师”。《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工作的意见》明确规定“社会律师和法律援助机构律师应当接受法律援助机构的安排提供值班律师服务”，即值班律师也是由公职律师和社会律师组成，经过一年实习且通过考核的青年律师当然具有社会律师的主体身份

2. 关于值班律师的工作内容。

根据《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工作的意见》规定，目前值班律师主要负责解答法律咨询、引导申请法律援助、转交申请材料、提供程序选择、申请变更强制措施等法律帮助，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时应当在场，代为申诉控告等。正如吴宏耀教授所言：“值班律师提供的是基础性和初步性法律援助服务，程序性的帮助，只要具有律师执业资格，就基本达到了值班律师所需的能力和条件，而且意见还引入值班律师名册制度，值班律师都需要经过遴选和培训才上岗，因此可以让新入行的律师来做。”^[1]

青年刑辩律师应当成为值班律师的主力军

1. 从低辩护率的现状和全覆盖的刑事政策要求看，从全国青年律师所占比重等方面看，从值班律师提供的法律服务具有初步性、无偿性、补偿性等方面看，青年刑辩律师无疑是最佳人选。

第一，从服务内容看，值班律师主要提供初

步、低限度服务，不用出庭辩护，不用像辩护律师进行实质性深度介入，如前文所讲青年律师能够胜任；第二，值班律师提供的服务具有无偿性和补偿性，在付出同样时间和精力条件下，资深刑辩律师更倾向选择“优质客户”，而非值班律师承办的刑事案件，退一步讲，即便硬性强加给资深律师承办，现实操作中，资深律师会委派自己的或律所的年轻徒弟去值班办案，法律援助案件大部分由青年律师承办便是证明，因此从制度设计上没有必要“转手”；第三，从低辩护率到全覆盖，需要大量律师参与，目前全国30多万律师，青年律师所占比重达到百分之六七十，青年律师具有“案少、学习能力强”等特点，相比而言有更充足的时间和精力承接此项任务。

2. 从青年律师生存、成长角度看，青年律师需要生存保障，需要办案成长机会。

众所周知，青年律师主要面临三个问题：案源匮乏、执业知识技能欠缺和心理压力极大。三者当中，案源匮乏是根本问题，案源匮乏导致的直接结果：一是经济收入低，生存压力大；二是接触案件少，办案技能得不到锻炼和提升。说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律师是法律实施者之一，我国在校法学教育侧重理论非实务，刚执业的青年律师要想尽快上手，必须要有大量的案子“练手”，通过“实战”提高技能、水平和业务素质。

恰到好处，刑事辩护全覆盖政策下的值班律师制度安排，给青年律师提供了承办案件的机会。而且，根据《意见》的规定“探索建立政府购买值班律师服务机制”，即值班律师能够获得一定的“补偿”，这种补偿可以解决青年律师的生存问题，在律师界“二八定律”的现状下解决了青年律师的后顾之忧。对青年律师而言，从律师行业人才建设角度看，青年律师和律师行业需要这样的务实机会。

刑事辩护全覆盖和值班律师制度的改革为青年刑辩律师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而青年律师也正是刑事法律援助的最佳人选，是值班律师的主力军。

确保青年律师在刑事司法改革中有效参与

青年刑辩律师应注重自我培养，律协应加强“岗前培训”并组织不定期知识技能培训，为实现刑事辩护全覆盖、为改变全社会刑事辩护观念作出积极努力。

如果说推动律师辩护全覆盖是解决刑事辩护“率”或“量”的问题，那么值班律师如何有效参与则是解决“质”的问题。提供高效、专业的法律服务无疑是值班律师有效参与的重要保障，而如何提升青年刑辩律师的专业技能水平则是提供优质法律服务的前提。

选拔有志从事刑事辩护的青年律师担任值班律师，并在值班前进行专项“岗前培训”

首先，在选拔青年律师组成“值班律师库”时，制定门槛和标准，从源头上保障办案质量。比如依据杭州市出台的《关于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中加强法律援助工作的意见》，要求建立认罪认罚案件律师资源库，并要求资源库律师必须执业3年以上，并承办刑事案件10件以上。执业年限和办案是否作为唯一入选标准，笔者持不同看法，根本在于该青年律师是否有志把刑事辩护作为主攻或专业方向。其次，因地制宜，结合所在地区律师人数、青年律师比重制定统一标准选拔入库。再次，结合意见中规定的工作内容，有必要律协牵头针对青年律师进行专项岗前培训，确保值班过程中，既规避执业风险，又确保有效完成任务。

青年律师应注重“投资”自己，加强自我培养；律协应在理念上对青年律师的培养工作予以重视，并像检察院、法院一样组织“不定期”、“多样式”的学习培训，提升专业知识技能

1. 认知决定思维，思维决定成长，内因始终是成长关键。

虽然目前师徒制仍是青年律师成长的主要模式，但是在信息公开化的自媒体时代，在互联网+法律时代，青年律师有多种途径可以抓取提高自身专业知识技能的一切有利资源。但前提是对选择专业方向、

对学习途径等自我行为拥有充分的认知。青年律师完全可以用有限的收入“投资”将来可能释放无限可能的自己，比如买书、购买视频讲座、参加刑事辩护论坛、培训班等。结合自身经验，笔者曾基于“分享、共建、互助、共进”的理念，创办8090青年律师社群，“多对一”、“一加一”、“自下而上”式学习，不足而论，收获颇丰。再比如可以向尚权所张旭华、大成所郑文鑫学习，善于总结，勤下笔头，把承办的每个案件吃透，日积月累遂走上“专业化”的道路。

2. 全国、省、市青工委和刑事辩护专业委员会等，应把青年刑辩律师的培养提上日程。

尽管目前值班律师的具体工作内容要求似乎并不高，但不排除随着改革的深入，对值班律师高标准要求。与此同时，纵观法律职业共同体中的其他法律人，无论是检察官还是法官，已经完成员额制改革，律师在办理刑事案件中面对的是经过层层考核、选拔的“高质量”的检察官和法官，然而，所有的律师都可以办理刑事案件，律师的办案技能水平是参差不齐的，如何“对抗”又如何“说服”？打铁还需自身硬，相比检察院法院的各种体制内公费培训，青工委、刑委会组织的业务培训逊色岂止三分。想必，这也正是司法部为何决定撤销刑事辩护专业委员会成立“刑事辩护协会”的原因之一。^[2]

结语

目前值班律师制度存在诸多模糊性，比如值班律师没有阅卷权、调查取证权，但面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真实性却要进行“见证”“背书”，这样是否合适？出现冤假错案是否要追究值班律师责任？究其原因是值班律师的定位不明。尽管如此，但刑事辩护全覆盖的改革政策势必向前推进，问题总会解决，而提高自身专业技能水平始终是青年刑辩律师安身立命的根本所在，也唯有此，方能担负起有效参与刑事司法改革、改变全社会刑事辩护认识观念之使命。

[1]参见：中国普法网《法学专家解读“两高三部”开展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工作意见》。

[2]参见：《田文昌：刑事辩护全覆盖的问题与对策》。

律师的角色定位及其执业伦理建设

胡建 周自明 安徽国梦律师事务所

律师的职业角色定位

我国对律师角色的认识经历逐步演进与提升的过程。1980年颁布的《律师暂行条例》明确地将律师定性为“国家法律工作者”。1993年国务院批转了司法部《关于深化律师工作改革的方案》，指出不再以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和行政级别的属性来界定律师及律师事务所的性质。1996年颁布的《律师法》第二条规定，律师是“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而不再是国家法律工作者，从而将律师的功能从行政权力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扩大了律师的社会参与作用。

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当时正处社会转轨初期，立法在实现律师性质定位由“国家化”向“社会化”转型的同时，并没有赋予必要的权利保障，一部原本旨在发挥律师法律服务功能的《律师法》，却用了一半以上的篇幅规定律师权利的限制和法律责任。《律师法》（2007修订）与原“律师法”第二条规定相比，“新律师法”的这一定义凸显了在时代的推进之下，律师职业性质定位的理性提升，强调了律师与客户的商业关系，将律师定位为“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具有一定的律师职业属性和职业内涵，但未能充分且根本地得到体现。回顾我国律师制度的发展，从“国家法律工作人员”到“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再到“社会中介组织”最后到“‘三个维护’的法律服务执业人员”的身份嬗变，反映出律师职业定位的价值取向从最初的国家主义到今天的商业主义。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逐步建立与完善，特别是民主法治进程的加快，对律师亦提出了更高要求。律师不能仅仅是为社会提供法律服



胡建

务的人员，还应当承担起制约国家权力、推进民主、完善法制的重要社会责任。很显然，将律师角色定位于社会法律工作者或社会中介组织人员，并不能满足社会对律师的角色需求，也没有全面反映律师的自身属性。国家权力具有无限扩张性，这种扩张性是不自主的、无意识的，也是依靠其自身机制不能限制的，按照现代国家的国家政治与市民社会“二元化”结构的理论，正是律师、民间社团和新闻机构的存在，国家权力才能被限制在民众可以接受的程度，律师虽然不是国家公权力的组成部分，却在公权力的运行过程中充当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他们通过自己对法律的理解为公民法人提供帮助，同时作为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有效缓冲力量，对公权力的行使进行监督，最大限度地促进法律的公平适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阶段的律师定位可以表述为：律师是共同与法官、检察官、公证员组成法律职业共同体，以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为职业伦理，依法从事法律专业性服务，实行行业协会自治的、独立的社会法律职业人员。

律师职业伦理建设的迫切性

职业伦理（Legal Ethics 或者Professionalism）乃律师执业者从事法律活动时所应当遵循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当事人与律师之间的关系，除了遵守委托代理合同的规则外，尚须受到法律职业伦理的规范。著名法学家庞德曾言：法律执业者所从事的是一种有学问和修养的艺术，虽然附带地以它谋生，但仍不失其替公众服务的宗旨。律师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中的一员，满足其物质生存当然是第一要务，然而绝不能为达此目的而违背法律职业伦理。

美国律师协会《律师职业行为示范规则》中曾明确规定：律师不应减损或放弃法律职业本身的独立性，应当避免接受当事人的不当操纵。律师执业过程中，若知悉自己的当事人存在欺诈行为，则该律师不应为委托自己的当事人提供任何形式的法律服务。美国甚至对于如何规范律师言论亦有明确的规定，在《律师职业行为示范规则》中存在专门的“审判宣传”条款，在该规则的第3条第6项明确规定：律师在参与某一法律事务调查或者诉讼的过程中，理应合理预见见到损害审判程序的实质可能性，除法院之外不能向大众媒介发布任何有关案情的声明。韩国的《律师事务员规则》和《律师伦理规则》、日本的《律师道德》、我国台湾地区的《台湾律师伦理规范》都对律师职业伦理予以细致的规定。如《台湾律师伦理规范》第47条明确规定：律师应为社会楷模，谨言慎行；律师职业乃社会公共职务，律师在执业活动中应兼顾社会公共利益与当事人的合法利益。可见，我国台湾地区的律师在执业活动中，其言行受到行业规范的严格限制。

以上各国家或地区对律师职业伦理的规定，内容主要集中于两点：一是对于伦理规范的诚实义务和对当事人的忠实义务，即以职业伦理作为自己最低行为准则，并让其获得最公正的审判，尽量争取最有利于当事人的结果以及保守当事人的秘密与隐私。二是律师应当“谨慎司法评论”，不得发表有损司法公正的言论，不得利用媒体非法干预法官的独立审判。

律师制度从西方引进，因而缺乏本土文化的基础，社会各界对律师的功能和作用缺乏认知。有的社会公众持有“请律师没用”、“打官司不如打关系”等认识，而部分司法机关亦存在“律师总是跟我作对”、“律师碍手碍脚”等误解。上述问题的形成，既有自身的认识误区，又存在律师职业素质参差不齐、职业伦理素质缺失的客观现实。少部分执业律师不能真正地遵守行业执业伦理，律师执业实践中仍存在为社会公众所诟病的“司法掮客”行为。虽然我国《律师法》、《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皆对律师职业伦理有所规定，但仍凸显出诸多现实问题：律师职业伦理规范的立法层次较多，权限不清；律师职业伦理规范的立法缺乏整体规划，互相重叠。律师职业伦理规范尚未取得较好的实施效果。律师职业伦理的惩戒机制不足等。这些又势必影响律师的执业行为和价值选择。

从律师职业的准入、岗前培训、日常执业和年终考核、违规惩戒等诸多层面，律师的职业操守和职业伦理必须规范。律师应谨言慎行，端正社会风气，作为社会表率；律师应当体认律师职业为社会公共职务，于执行职务时，应兼顾当事人合法权益及公共利益；律师执行职务，应基于诚信公平、理性和良知；律师不得违反公共秩序、善良风俗或有损律师尊严与信誉之方法受理业务。

律师职业伦理建设的法律机制

基于律师的职业角色定位，律师具有两重性：一是私人的服务利益，二是公共利益的维系者。律师不仅要委托人对委托人负责，而且要对国家和社会负责。全世界的律师都应当在两个维度之间确立一个合适的中心点——律师职业伦理，既能维护客户利益，又能遵守职业道德，避免妨碍司法公正。律师业务的展开，不能纯粹以赢利为目的，贿赂法官、检察官，伪造、毁灭证据，破坏司法公正。律师职业关涉公民权利和社会正义的实现。律师生活在两个维度之间：一是律师业务，提供的是法律服务；二是维护司法正义。创设律师制度的初衷，乃在维护委

托人合法利益之基础上，使公民能够通过律师的执业活动来防止和约束公共权力的滥用，实现权力的制衡。

与法学教育制度的衔接

律师职业伦理的缺失凸显法学教育与法律实践的脱节。法学教育中缺失“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培养目标和相关课程设计。法律职业伦理为一个合格的法律人所必备的基本素质，高校法科学生的培养目标中不应缺失“法律职业伦理”的应有内涵。此外，高校课程设计中缺失法律职业伦理教育。早在20世纪30年代的民国时期，除东吴大学和中央大学外，国内高校基本未开设法律职业伦理课程。法律职业伦理是美国律师准入考试的单独科目，更是美国法学院的必修课程。与对法律技艺培训和法学理论传授的高度关注不同，今日国内643所法学院对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重视程度存在明显的差距。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重塑必须确立职业伦理教育在法律卓越人才培养中的地位，构筑合理的教育方案和科学的教材体系，完善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评估机制和法律职业准入机制，以及根植法治理念以孕育法律职业伦理的成形。

与国家统一的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制度衔接

律师职业的准入机制设计中增加“律师职业伦理教育”的考核条件。国家统一的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报考条件中欠缺对“职业准入者”的“法律职业伦理”教育要求，其报考条件中仅要求取得法学的学历教育经历，而对于是否接受过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并无要求。很多通过国家统一的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考生，对其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在准入法律职业共同体之前是空白，唯有寄希望其内省自学和道德自觉。法学职业伦理教育不能证明它自身的价值，那么它被人忽视的境遇是再自然不过了。严格意义上而言，对一个法律职业共同而言，从业者的职业伦理比其职业技能更为重要。

法律职业的准入机制设计强调了对“职业准入者”的法律技能要求，却缺少对“法律职业伦理”的内在关注，应在获取法律职业资格证书的报考条件

中应增加对“职业准入者”的“法律职业伦理”教育要求，可在法律职业的准入机制设计中设置“接受过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条件要求，同时，司法考试的具体测试内容中可以增加法律职业伦理方面的考核内容与比重。

与律师日常考核与惩戒制度的衔接

律师职业伦理要求须贯穿岗前培训、日常执业和年终考核，以根植律师的法治理念和法律信仰。对于违反律师职业伦理的行为，扩展现行的惩戒措施或手段，并加大相关惩戒力度。尽管不同国家的律师惩戒制度在具体内容上有所不同，但它们在惩戒体系方面有一些趋同化的特征。第一，各国律师协会拥有的惩戒权力与本国的司法传统及律师协会的自治程度有很大关系。在美国和英国，基于法院监督律师的司法传统，法院在律师惩戒方面拥有较大的权力；而在律师行业高度自治的日本，律师行业协会拥有完全独立于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惩戒权。第二，律师惩戒程序呈现司法化倾向。即使是在由律师协会行使行业惩戒权的国家，如日本、法国，对律师的惩戒也是按照类似司法的程序进行。第三，行业协会的惩戒权可接受司法审查。“任何一个国家，法院在律师惩戒权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有些享有惩戒监督权，有些掌握惩戒决定权。

通过根植法治理念和法律信仰，孕育法律职业伦理的形成

法律信仰和法治理念有助于良好法律职业伦理的形成，其对执业者具有潜移默化的功能。根植法治理念和法律信仰，是培养人们法律职业伦理的最有效和最根本的途径。深谙法律弊端，法律人易生轻侮法律之心。洞悉法制弱点越多，越容易低估违法风险，法律执业者若背离法律职业伦理而越界，则必将身陷囹圄。法律职业伦理的存在能发挥制约法律职业异化的功用。坚守法治必先信仰法治，唯有真正树立宪法和法律权威，并建立一种以法治规则和正当程序为基本特质的治理秩序，法律才能成为解决纠纷的最终途径，法律执业者亦才可能从内心信仰法治和恪守法治理性。

第十届中国律师论坛圆满落下帷幕



深沪两地律协会长交接论坛旗帜

1月8日上午，第十届中国律师圆满闭幕。

来自东中西部的北京、上海、青海、山东、黑龙江、广西六省（区、市）的律师协会会长，围绕在新时代如何面对新格局、把握住新机遇、展现新作与参会律师一起共话律师行业发展。

律师协会会长作为行业带路人，来自律师，奉献行业，对行业发展有着独特而深刻的体会。六位会长在交流中介绍了各自省（区、市）律师行业的发展情况和面临的问题，谈到了他们作为会长的所思所想，并从完善体制机制、加强自身建设、加强秘书处建设等方面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正如全国律协副会长吕红兵主持时说，六位会长，新话发展，话新发展，说的都是实话、真话，诤言、直言，干货、硬货。

全国律协会长王俊峰、深圳市律师协会会长林昌炽、上海市律师协会会长俞卫锋进行了论坛旗帜交接。中国律师论坛是行业的盛会，也是行业发展的记录，从2001年到2018年，从首届到第十届，一路发

展，一路相伴，下一届将相聚东方明珠——上海。

全国律协会长王俊峰致闭幕辞：论坛能够成功举办，离不开司法部党组的重视与支持。本次论坛以“《律师法》修改与深化律师制度改革”为主题，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反映近年来我国律师行业发展成就，围绕当前深化律师制度改革的部署，聚焦律师行业前沿和热点问题，搭建政策理论和实践经验研究分享平台，提高广大律师执业能力与水平。

相见时难别亦难，第十届中国律师论坛在律师代表们的热烈讨论和思想碰撞中落幕。第十届中国律师论坛从筹备到召开不过三个月，时间紧、任务重，广东省司法厅、省律师协会、深圳市司法局、深圳市律师协会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深圳市南山区政府为保证论坛顺利、圆满、成功举办给予了很大的支持。

帷幕徐徐降下之时，我们总会有很多不舍和依恋。幸福，是奋斗来的；发展，是脚踏实地干出来的。述说着春天的故事，中国律师沐浴新风走进新时代。